

おね文央殿

あの子

王様殿

三月十日

搞好文史工作

振奋民族精神

邢其浩 八七三

认真搞好文史资料

征集研究工作既可教育

当代人，又惠及后代

五二之栋

五二之栋

## 前 言

《莘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县委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及全县各界人士支持下，与大家见面了。致此，谨向积极为本会提供资料，撰写稿件，绘图摄影的同志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史资料工作，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倡导，是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可以补史之缺，纠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还可以受益当代，惠及后世，发展统战，服务四化。

莘县并原濮、范、观、朝为一县，历史悠久，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史料丰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工商、科技、民族、宗教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人物

和重大事件。特别是近百年来，莘县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前赴后继，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辑录成书，传诸于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因此，殷切希望全县各界人士将保存的历史文献、档案、图片、书籍、文物等提供本会；希望了解和熟悉我县近百年来史实资料的同志和朋友，尤其是革命老前辈，将自己亲闻、亲见、亲自经历的史实，或调查整理的各种史料，不拘题材，不限篇幅，不论语体文言，利用各种形式，秉笔直书，汇成篇章，惠寄本会，不胜感谢。

本辑内容，由于作者经历相互差异，所记史料可能受到一定局限，加之参考材料不足、调查研究不够和编写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了解史料内情者及各位读者斧正

賜教。

政协莘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

# 目 录

- 莘县概况.....县志办(1)
- 莘县建制沿革.....魏辑民(33)
- “七·七”事变前后原莘县政况简介  
.....姬洪九(42)
- 里应外合智取莘县城...曹丕堂 范永堂(71)
-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属部盘踞我县古云集一  
带的罪行.....莘县政协文史委员会(92)
- 日伪时期伪区、乡机构和保甲制  
.....郭希文(102)
- 汉奸县长刘先洲、李海泉.....  
郭希文 邹荣川 赵仙如(106)
- 莘县回族简介
- 概况·渊源·人口.....  
《莘县回族志》(111)
- 莘县境内八坊清真寺小考...杨忠平(121)

张鲁查拳与拳师……………杨忠平(129)

访抗战时期回民支队教长蔡永清……………

杨忠平 马军(135)

## 革命遗址

丈八鲁西北烈士陵园……………杨新民(151)

张鲁马本斋烈士陵园……………杨忠平(154)

莘野古迹 千古光华……………王合祥(157)



# 莘 县 概 况

**位 置** 莘县位于山东省西部，黄河北岸，聊城地区西南端，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地处北纬 $35^{\circ}48'$ 至 $36^{\circ}25'$ ，东经 $115^{\circ}20'$ 至 $115^{\circ}43'$ 之间。北与冠县相接，东北与聊城市为邻，东和阳谷县以金线河为界，南依金堤河与河南省范县隔水相望，西部和西南部分别与河北省大名县，河南省南乐、清丰、濮阳县毗邻。东西宽32公里，南北长68公里，总面积为1,387.74平方公里。

**区 划** 清康熙年间，共分五乡，清末置18里。1931年下没6个区，98个乡镇，450个自然村。1939年莘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全县置六个区。此后莘、朝（北）、元（城）、濮、观（城）、范等县时分时合，

变化频繁，至1964年本县设16个区。1971年撤区设21个公社。1983年设一个镇20个公社，1,116个大队，1,208个自然村。现设23个乡（单庙、河店、燕店、邹巷、魏庄、大王寨、岩集、王奉、刘庄、俎店、董杜庄、妹冢、张寨、徐庄、十八里铺、王铺、王庄集、马集、柿子园、大张家、古云、樱桃园、舍利寺）、5个镇（城关、张鲁、朝城、观城、古城），辖1,116个大队，1,208个自然村；4个办事处（城关、马西、朝城、樱桃园）。

人 口 1949年共455,800人。1983年底为757,800人，每平方公里平均546人。性比例为102·49（女二100）。农业人口占96·2%，非农业人口占3·8%。出生率为15·25‰。死亡率为6·63‰，自然增长率为8·95‰。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为736,327人。其年龄构成为18岁以下的318,636人，占43%；19—60岁的350,364人，占47.6%；61—80岁的63,731人，占8.7%；81岁以上的3,896人，占0.5%。每千人中有大学生0.97人，高中生38人，初中生120人，小学生309人；文盲、半文盲占12岁及12岁以上人口的49.98%。

民族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汉族728,945人，占98.9%，回族7,651人，占1%，主要分布在张鲁、朝城镇；蒙古族2人，朝鲜族9人，满族7人，白族、傣族、藏族各1人，壮族9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1人，散居境内。

## 自然条件

地质 在一级地质构造单元中，莘县属于华北地台；在二级地质构造单元中，属辽冀台向斜。境内有四条断层：一是聊（城）——兰（考）大断裂，从莘县的徐庄、袁屯一带通过；二是马陵断层，经莘县的张寨一带进入河南省；三是堂邑断层，由东北方向进入莘县，经过河店、王化、董杜庄一带；四是冠县断层，由东北方向进入莘县西滩一带。断层将本县地壳分割为四个四级构造单元。自第三纪以来，一直为长期下沉之中，由于周期性的构造运动，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隆起与凹陷。地层均为第四纪地层所覆盖，主要由砂质粘土、粘质砂土及粉砂、细砂组成，局部区域存有中砂。厚度一般在190——230米之间。

地形 莘县属黄泛平原，地势平坦，土

层深厚，坡度平缓，西南高，东北低，坡降为六千分之一，海拔在30·6——49·0米之间。由于历史上河流多次泛滥改道，形成了河滩高地、缓平坡地、浅平洼地和背河槽状洼地等组成的地貌。

河流 境内主要河流有徒骇河、马颊河、金堤河三条。徒骇河源于本县古云乡文明寨东，自南向北，至城关镇东部李凤桃入聊城市境，全长68公里，流域面积为1,066·2平方公里；马颊河自俎店乡沙王庄西入境，贯穿西部高地，从魏庄乡信庄东入冠县境，全长31公里，流域面积267平方公里；金堤河自古云乡高堤口入境，沿县南界向东北方向，至古城东入阳谷县境，全长33·6公里，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

气候 本县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春旱多风，夏季湿

热，伏秋易旱，冬寒干燥。年平均气温为  $13.2^{\circ}\text{C}$ 。极端最高气温为  $41.7^{\circ}\text{C}$ （1960年6月21日），极端最低气温  $-22.7^{\circ}\text{C}$ （1971年12月27日），年较差为  $29.4^{\circ}\text{C}$ 。常年无霜期为199天，最长为223天，最短为177天，平均初霜日为10月22日，最早为9月30日（1965年）。年均降水量为  $572.3$  毫米，降水量最多年（1964年）为  $942.4$  毫米，最少年（1981年）为  $308.6$  毫米，全年降水集中在夏季，6—8月份降水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63.2\%$ 。全年日照时数以5、6月份最多，月均为264小时左右，冬季最少。年总日照时数为  $4,432.3$  小时，光照较好。月均相对湿度为  $63\%$ ，一年中8月份最大，为  $81\%$ ，5月份最小，为  $58\%$ 。年平均风速  $3.2$  米/秒。冬季盛行偏

北风，其他季节盛行偏南风。

**自然灾害** 历史上旱涝灾害严重，建国后旱涝也多有发生。1961年水涝灾害面积达80·6万亩，1963年水涝平川足以行舟；1966年旱灾面积为67万亩。其特点是交替性、连续性。据气象部门29年资料分析，旱涝交替出现18次，连续出现10次。

**季节性：**夏涝春旱，有“十年九旱”之说。

**突发性：**夏季有时一次大暴雨就使本县转旱为涝。

**周期性：**以120年周期较明显，并存在着50年干湿期的演变过程。

**地域性：**受地势影响，东半部易涝，西、中部易旱。干热风，干热风多出现在5、6月份，每年均有发生，一般干热风能使小麦减产10%至15%左右。

**冰雹，**1957——1982年出现了12次较大的雹灾。最严重的一次为1978年8月9日，受灾面积达44万亩，主要集中在

在6月至8月份，城关、十八里铺、俎店、张鲁、单庙、河店、燕店、魏庄、王奉、大王寨及西南部地区平均2年至3年一遇；古城、朝城、柿子园一带，平均十年一遇。常见的自然灾害还有低温连阴雨、冷寒、霜冻、大风、地震等。

**土 壤** 境内共分三个土类，8个亚类，8个土属，71个土种。土壤表土分为砂质、壤质、粘质三种。其中砂质土占总面积的18.2%；壤质土占总面积的81.8%；粘质土占总面积的0.1%。从土壤1.5米剖面看，层次分明，分为“蒙金地”、“透型地”和“漏型地”三种，均呈中性或微碱性反应。主要土类分为潮土类，又分潮土、褐化潮土、盐化潮土、碱化潮土4个亚类，占总面的91.5%。潮土亚类有1个土属、20个土种，面积77.19万亩，占总面积的37.



09%，主要分布在莘范干沟以西。马颊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土壤表层为轻壤质和中壤质，土体内有粘质和砂质夹层，地下水较丰富，耐干旱，有“夜潮地”之称，易耕作管理，保肥性能好，是全县主要粮棉产区。褐土化潮土亚类有一个土属，27个土种，面积为90·27万亩，占总面积的43·37%，主要分布在河滩高地上，其表层多为轻壤和砂壤质土，易操作管理，通气性好，供肥性好，但潜水位低，地下水补给困难，易受干旱威胁。盐化潮土亚类有1个土属，20个土种，其面积为22·48万亩，占总面积10·80%，大部分处在浅平洼地上端，与潮土呈复区分布，水分蒸发量大，地表积盐含量过高，常抑制作物的生长发育。碱化潮土亚类有1个土属，1个土种，面积为4，785亩，所处的地势较洼，雨季易涝，土壤结构、通气性状和

供肥能力较差，粮棉产量极不稳定。盐土类为潮盐土亚类，为潮盐土一个土属，面积2·69万亩，占总面积的1·29%，主要分布在十八里铺、徐庄等乡，土壤含盐量过高，一般耕层含量超过0·5%，采取多方面改良措施，方能利用。风沙土类有流动风沙土、半固定风沙土、固定风沙土三个亚类土属，不分土种，主要处在决口扇形地带，地形部位高，土地不平，质地较粗，潜水位低，分布在大王寨、王奉、岩集乡，占总面积的7·23%，适宜发展林业、绿肥和畜牧业生产。

资源 土地资源，总面积为206·77万亩，其中已利用的耕地134·58万亩，占65·1%；林占地和果园占地12·96万亩，占6·3%；尚未利用的沙碱荒地12·91万亩，占6·2%；村庄、沟、路、河、渠占地46·32万亩，占22·4%。

水资源，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72·3毫米，产水总量为4·91亿立方米，河道入境客水年均4·5亿立方米，地下水总补给量年均1·75亿立方米。水资源可利用量为2·4亿立方米。水资源地域分布不均，徒骇河以南引河条件较好，井河并用，基本能满足需要，马颊河以西和河店一带，水资源只能满足60%左右。

生物资源，野生植物以茅草、芦苇、碱蓬、沙打旺、青蒿、麻豆秧、水白、蒺藜为多见；水生类有鱼、虾、蚌、螺、甲鱼、青蛙等；野生动物有獾、狐狸、黄鼬、刺猬、蛇、壁虎、蜗牛等；鸟类以喜鹊、麻雀、燕子、鹰、啄木鸟、鹌鹑等为多见。

药材资源，主要有土元、蒲公英、地丁、茵陈、兔丝子、枸杞子、蝉蜕、香附、野菊等。

矿产资源，境内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古云、大张家、观城等乡镇一带，属中原油田，目前国家正在开采。

## 经 济 状 况

生产构成（见工农业总产值一览表）

# 工农业总产值一览表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项 目	1949年		1966年		1978年		1983年			
	产 值 (万元)	占 % %	产 值 (万元)	占 % %	产 值 (万元)	占 % %	比1949 年增长 (倍)	比1966 年增长 (倍)	比1978 年增长 (%)	
工 业	总 产 值	4,711	100	9,072	100	17,207	100	7.77	3.56	140.18
	其中	4,652	98.75	7,673	84.58	11,708	68.04	7.83	3.14	171.25
农 业	农业	4,228	89.75	5,955	65.64	8,983	52.21	5.35	3.51	198.80
	林业	0.2		113	1.25	711	4.13	3210	4.68	-9.70
	畜牧业	266	5.65	598	6.59	1,017	5.91	6.35	2.34	96.17
	副业	157	3.33	1,004	11.07	986	5.73	13.38	1.25	129.00
	渔业	1	0.02	3	0.03	11	0.06	21	6.33	100.00
工 业	总 产 值	59	1.25	1,399	15.42	5,499	31.69	161.20	6.15	74.03
	其中									
	重工业			47	0.52	3,555	20.66		18	-74.88
	轻工业			1,352	14.90	1,944	11.30		5.42	346.35
人平均产值(元)	105		164		245		4.34	2.42	128.98	

农业历史上地瘠民贫，作物生产单一，农民靠天吃饭，生活十分贫困。1949年大旱，饿死约2万余人，有的村庄出现了地无人种、村无人居的惨景。

建国后，农业生产显著发展。1983年有耕地134·58万亩，人均耕地1·97亩。有拖拉机1,632台，农用汽车56部，农用排灌机械13,461台，配套机井8,041眼，农机总动力28·23万马力，机耕面积80·73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01·69万亩，稳产高产面积76·7万亩，分别占耕地的75·5%和5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上升。1983年虽遇到特大干旱，仍获大丰收，184·24万亩粮食作物总产达55,328万斤，单产960斤，比1949年增长9倍多；棉花61·94万亩，总产8,445万斤，单产136斤，创

历史最高水平；农业产值26,841万元，为1949年的9倍。传统的耕作制度为一年一熟、二年三熟制。主要种植作物有棉花、玉米、谷子、大豆、地瓜等。目前一年两熟制面积逐渐扩大，作物组合为前茬小麦后茬早熟棉花、玉米、谷子、大豆等。随着耕作制度的改善，复种指数明显上升。

林 业 建国前林业以四旁零星植树为主。建国后，林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东治碱、西治沙、中部大搞林网化”的总体规划，至1983年全县有林地面积10·7万亩，农田林网60万亩，农林间作13万亩，四旁植树1,025万株，林木总蓄积量为43·8万立方米。覆盖率为11·2%。1982年利用联合国资助营造丰产林3万亩的工程项目，已完成29,250亩，成活率均在90%以上。经

联合国评估组检查，给予了好评。

**畜牧业** 建国后，畜牧业不断发展。1983年全县大牲畜存养量为6·4万头，其中牛2·96万头，马0·47万头，驴2·73万头。生猪存养量10·4万头，出栏6·2万头。当年猪肉产量1,028·5万斤；羊存栏量13·5万只；养蜂969箱；家禽饲养量约97·2万只，产蛋量520·06万斤；兔存养20万只。畜牧总产值1,995万元。

**渔业** 境内能利用的水面较少，1983年全县水产总量183吨，总产值22万元，其中人工养殖810亩，产量61吨，收入为7·42万元，占总产值的64%。

**副业** 1983年从事副业生产的个体户有23,660户，123,367人。队办企业201个，生产项目250项，总产值



达2,258万元。其中砖窑厂135处,收入1,129万元;建筑队18个,收入36万元;六坊(油、磨、粉、豆腐坊等)收入21万元;果园面积18,295亩,水果收入19万元。

工业 建国前,工业十分落后,主要是家庭手工业,铁、木作坊,生产加工一些小农具。1949年,全县个体手工业525个,集体2个,工业总产值52·20万元。建国后,工业发展迅速。到1983年已拥有机械制造、电力、轻纺、化工、建材、食品加工等十几个门类,166个企业,其中国营10个,集体156个,职工总人数11,738人,固定资产净值3,155万元,定额流动资金7,692万元,工业总产值为9,570万元,比1949年增长17·3倍。

工业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主,

其产品有54种。县皮毛厂生产的五种产品远销英、法、日、美、德、澳等二十个国家。朝城毛刷厂出产的毛刷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

**交 通** 建国前,全县仅有公路2条,全系土路面。旱季风沙,雨季泥泞。建国后,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现以县城为中心,公路四通八达,禹范线、胶长线、邯寿线等公路干线纵横贯穿县境。1983年有干线公路4条,长达115.6公里。其中沥青路97.6公里,乡、镇路10条,总长164.7公里,乡、镇沥青路50.4公里。有客车30部,客运量达365万人次,客运周转量达14,608万人公里,货运车辆228部,货运量39万吨,货运周转量318万吨公里。

**邮 电** 1873年始设邮寄代办社。

1919年改为邮局,设局长、信差各一名,专送城内信件,后增添村差一名,专送乡村邮

件。1933年设置邮电分局，通长途电话。建国后，邮政事业迅速发展。到1983年共有邮电支局20处，邮电所一处。邮电设备有电传电报机2部，载波机53端；长途交换机50门，农村电话交换机122门，用户话机433部；邮政汽车2辆，邮路长度211公里，农村投递路线2，203公里，全年业务收入46·47万元，邮电业务总量63·29万元。

商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日趋兴隆。1983年有商业网点4，391个，从业人员7，352名。其中全民139个，1，387人；集体所有制4，252个，5，965人；个体商业户4，005个，4，743人。主要经营项目有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生活资料及消费品等。当年社会商品购进总额11，404万元，销售总

額13,685萬元。主要集市30個，成交額1,675萬元。外貿商品收購11個門類，48個品種，收購額565萬元。

財 政 1978年收入320·8萬元，支出1,224萬元；1983年收入1,034·1萬元，支出1,474·5萬元。

人民生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城鄉人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83年社員分配25,360萬元，人均分配355元，為1978年的10倍。社員存款4,150萬元，城鎮居民存款673萬元。群眾對電視機、收錄機、輕騎、手表等一些高、中檔商品需求量越來越大，名牌產品供不應求。

土特產品 辣椒干主要產于朝城鎮和妹冢鄉，暢銷國內外，被譽為佐食佳品；荸薺，個大、皮薄、無渣、味美，深受歡迎，多產于城

关、妹冢等地；草帽辫，属统传手工艺品，用麦秸杆编制而成，分粗细多种，盛销国内及南洋、英、美等国。

## 文 化 事 业

文 艺 建国前，只有“山东梆子”、“两夹弦”等几个民间小戏班子和盲艺人的说唱活动。除元宵节“跑竹马”等民间歌舞外，平时没有什么群众文艺活动。建国后，文化事业生机盎然。1983年有县文化馆一个，乡镇文化站20处（中心站5个），新华书店12个，大队俱乐部186个。图书馆一个，藏书四万册。专业剧团2个，著名地方戏曲有“豫剧”、“河南坠子”、“两夹弦”、“山东梆子”等，还有“龙灯”、“花船”、“抬犎”等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有电影院7个，其中县办2个，乡、镇办4个，队办1个。共有电影队73

个。1980——1983年放映52,600余场，观众达5,260万余人次。县有广播站，各乡镇广播放大站21个，投影电视机两部，电视录放机五部。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业余创作活动的繁荣，全县文艺创作骨干24人。1983年创作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18篇；美术作品参加省美展18件；音乐曲艺作品发表30件，参加省汇演节目5个；剧本发表3个，参加省级汇演节目2个；摄影作品在全国一级报刊上发表10幅，省级报刊发表27幅，参加省摄影展览9幅。

**教育** 1949年初，全县小学408处，在校生26,000人，建国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5年，全县拥有小学961处，在校生98,624人，儿童入学率为90%；中学53处，在校生20,950

人；师范学校一处，在校生359人；农业技术中学5处，在校生764人；教师进修学校一处，在校生129人；电大收看站一处，参加学习人数164人。共有教职员工5,198人，其中教师4,050人。自1977年以来，向大专院校输送了大批人材。

科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工作迅速发展。1983年统计，全县拥有科学技术人员5,440人，其中工程师级85人，助理工程师级206人，技术员级1,329人，农民技术员1,329人。共取得重要科技成果34项，其中，河店供银社潘贵忠研制的“电子四防警报器”，获团中央青年科研一等奖；工程师叶忠雄研制的“变压器安全停送电装置”和工程师张文甫等研制的“甜高粱杆机制砂糖”，获省科研成果三等奖；大张家乡电炉厂科技人员研制的“电炉耐热

件”，填补了国家空白，达到国际水平。

卫 生 解放前，缺医少药，疫病流行。1949年，在县城内建立一所医院，医疗技术人员仅有17人。建国后，卫生事业迅速发展。1983年全县拥有医院22处，床位782张，从医人员1,337人。其中医师180名，医生457名，大的厂矿企业均有卫生所、门诊室，1,116个大队有948个建立了卫生室，有乡村医生1,509人，建立了一个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由于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天花、瘟疫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早已绝迹；麻疹、疟疾及其他地方疾病也基本得到控制。

体 育 建国前习武者颇多。回民聚居地朝城、张鲁出现了蔡少先、杨恩成等著名拳师；古城、王奉、妹冢等地也设有练武场，涌现出



了许多武林高手。1935年县师范讲习所和东街初小联合举行了田径运动会。1941年举行了县小学田径运动会。建国后，体育发展很快，群众性体育活动以武术、篮球、田径项目为主，较为普及。体育机构逐步健全，专职教师90余人。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全县培养出了许多优秀教练员、运动员。朝城运动员张思温多次出国比赛，现任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朝城运动员王朝群在省排球队，现到国家排球队训练；樱桃园女乒乓球运动员刘伟，曾获全国少年女子单打冠军、全国优秀选手单打比赛第二名、全国乒乓球混合双打第二名。在省、地比赛中，莘县代表队多次取得好成绩。县乒乓球队多次获得聊城地区团体第一名及单打、双打男女冠军和山东省乒乓球比赛女子单打冠军。田径代表队多次获得地区总分第一名。篮球队多次获得地区第二名、第三名。近几年来

气功、太极拳等项目的热爱者日益增多。

## 重 大 事 件

**马陵道之战** 魏惠王三十年（公元前341年），齐国军师孙臧率军救赵佯攻魏都，用减灶之计，将庞涓引至马陵、道口（今莘县大张家乡马陵和樱桃园乡道口）后，以有利地势向魏军发起攻击，俘虏太子申，庞涓自刎、魏全军覆没。

**红旗军起义**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捻军进入山东，白莲教中邱莘教派首领张遇获、靳守印等聚众数千起于莘县，称“红旗军”。二月初攻占阳谷，与张秋石怀谦、定水镇王存重等汇合，军威大振，后与捻军配合，继克寿张、濮州、范、朝、观等县。后遭僧格林沁数倍敌人镇压。

**莘县事变** 1938年11月14日，国

民党山东民政厅长李树椿陷范筑先于聊城后，至莘县与当地反动分子策划杀害莘县县长吕世隆。11月17日，刘仁骏、张腾魁等人包围了县政府，枪杀了吕世隆（中共党员），扣压了县政府其他人员。23日，由鲁西共产党组织掌握的武装力量十支队机枪营奉命至莘，欲继续保持莘县抗日政府，后中敌缓兵之计，遭数倍于己的敌人袭击，队伍撤至城北河店，又遭敌人包围。后遇八路军青年纵队增援，给敌人重创，突围至馆陶整休。莘县事变，使鲁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瓦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公开化。

**苏村阻击战** 1943年7月1日，冀鲁豫军区警卫营125名指战员，为保卫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边区党政机关及当地军民的安全转移，同配备四架飞机、八门大炮、八十多辆汽车的一千多日军于苏村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血战两昼夜，阻击了十倍于己的敌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除两名战士受伤被群众救出外，其余123人全部壮烈牺牲，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解放莘县城** 1944年7月底，赵健民司令员率鲁豫七分区二十二团和地方武装压境于莘县城下。城内地下工作者巧作内应，一举攻下城垒，全歼守城之敌，活捉了伪县长刘仙州。8月1日全部解放。

## 著名人物

**伊尹** 名挚，或称阿衡或保衡，生卒不详，自幼于莘为人耕田。夏末，汤伐桀，三聘伊尹，任其右相，后辅汤灭夏建商，为开国功臣。汤死，继辅佑四帝，成四世元老。伊尹百岁终，被后世称为贤相，历代传颂。

**王显** 字世荣，生卒不详，莘县人，精于医术，兼有明断。北魏文昭太后怀宣武，疑疾，显观之，断生男之像，后果如显言，被召

为太医。显严明清介，百僚敬佩，著有“医方”三十五卷。

王旦（957—1017）字子明，莘县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1001年（真宗咸平四年）任参知政事。1006年（景德三年）拜相，旦自幼好学，为人稳重。澶渊之役时，留守京师，曾拒绝契丹、西夏求钱粟之请。真宗曰：“为朕治太平者必斯人也”。仁宗赞之曰：“可谓全德元老。”死后封为文正公，欧阳修为之撰“宋王文正公碑”。苏东坡为之作“三槐堂序”。

王伦（1084—1144）莘县人，字正道。1127年（宋建炎元年）以朝奉郎假邢部侍郎赴金，被扣至绍兴二年（1132）年放还。七年第二次赴金，见挾懒。次年复与金使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约定和议。绍兴九年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赴金，被兀术扣留死于北方。

孙大安（1902年—？）字仁山，莘

县老宅村人。少年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聊城）读书。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随军北伐，转战江西各地，后又入武汉革命政府设立的黄埔军校学习，在此期间，常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罪行。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派大安回聊城从事革命活动，任鲁西县委委员。12月，领导组织了坡里暴动，任军事部主任，失败后，又去南京黄埔军校学习。1930年10月，在国民党二十六军任少校团副兼营长。1931年12月率本部官兵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间，去福建闽侯一带做地下工作，同年秋失踪。

吕世隆（1909—1938）字道宏，泰安县人。1933年秋，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学习期间，为“一二·九”救亡运动之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被派到聊城范筑先将军部，初任政训处干事。

1938年1月，被派往莘县，为莘县第一个有共产党员担任的抗日县长。任职后，积极组织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推行抗日政令，掀起了莘县抗日高潮，各方面工作突飞猛进，为鲁西各县之冠，被誉为模范县长。1938年11月，惨遭国民党反动分子杀害，卒年29岁。

马本斋（1901—1944）河北省献县人，回族，曾任旧军队排、连、营、团长。1939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回族教导总队队长，回民支队司令员，冀鲁予三分区司令员等职。1942年9月，率回民支队进驻莘县张鲁一带，转战莘、冠、朝等县，多次给日伪以沉重打击。1943年指挥了著名的八公桥战斗，全歼伪孙良诚总直属队，名震四方。1944年2月7日因病逝世，同年4月延安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同志送了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肖永智（1915——1943）湖北黄安县人。1930年投奔红四方面军，1932年入党，参加了万里长征，历任冀南三分区、七分区政委，三地委书记等职。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1943年率部队至鲁西一带活动，狠狠打击了敌人，军威大振，不幸于1943年10月遭敌袭击，壮烈牺牲，享年28岁。

徐开先（？—1939）莘县人，1934年入党，在中共上级组织帮助下，建立了第一个莘县农村党支部——徐庄党支部。1939年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刑场上，与敌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 莘县建制沿革

魏辑民

莘县位于山东西部，系并入朝城、观城两县及范县北部建置，属聊城地区，徒骇河、马颊河上游，南邻河南，西接河北，东靠阳谷，北与冠县、聊城接壤，幅员较广，历史悠久。现仅就原莘县之历史考查，系任圣躬耕畎亩乐道之处，至圣周游列国数经之地，在史册上已享有盛名。现将其历代沿革及名称由来考述如下：

粤稽夏书禹贡“禹别九州，济河惟兖，九河既道。”方輿纪要注曰：兖州，今山东省东昌府及济南府北境，兖州府西境，又兼有北直大名府，再考查南邻朝城，上溯至夏朝，亦属兖州之域（见朝城县志），莘县居其中，属于

州则确凿无疑。

“九河既道”即孟子所说之禹疏九河，滹济漯而注诸海，所谓九河者，一曰徒骇、三曰马颊，莘县居其上游，充分证明，当时之莘县亦禹王治水周旋之地也。

商：按汉书地理志：“殷因于夏无所变改”，仍属兖州，夏之末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汤三使往聘之，乃相汤以有天下”。据莘县志先觉院记载：莘县北门曰伊田，伊田之北八里，古有莘亭建自汉时，亭废基存，世传伊尹耕莘处也。后周因此名曰莘亭县，隋改莘州寻改莘县，推而言之，由于伊尹耕莘，门曰伊田，亭曰莘亭，继之而莘亭县、莘州、莘县。莘县之名称由此而来。纪念伊尹之深远意义存焉。

所以至清朝康熙五十五东昌府知府程光珠，访求遗迹，大书“莘亭伊尹耕处”六字，

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云虎风，令知县刘萧勒石志之，以垂不朽。大里王村西碑铭犹存。

周鼎既定（公元1122年）曰九州，周书职方，莘亦属兖州，其地在卫与齐鲁犬牙相错之间（见光绪莘县乡土志）。

庄王六年（公元前696年）卫宣公纳其子伋之妻，曰宣姜，生寿及朔，宣姜与朔构伋，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寿先为之死，继之伋亦死焉。二子交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赋二子乘舟（见诗经）思伋寿也，通鉴注曰：莘，今山东东昌府莘县。有莘亭故址，“春秋”卫地。二子墓在莘县南十八里铺公社张庄，俗名“太子冢张庄”，墓基亩余，至今犹存。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45年），与楚大战于城濮，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陈于莘北，楚师败绩。观师有莘，即观师卫境，

莘之属卫无疑（见光绪莘县乡土志）。

再就东鲁店来考，据光绪莘县志记载：东鲁店：孔子二十岁自鲁适卫、学琴子师襄，寻返。五十四岁失鲁司寇，去适卫，六十八岁自卫应召归鲁往来于此，不一而足。今东关甘泉东南北街十数人家，是其旧址，亦证明莘系当时卫与齐鲁犬牙相错之间。

战国时代（公元前423年）诸侯互相兼并，存者惟有七雄，时为齐之西界。（见读史方輿纪要）。

秦始皇（嬴政）三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罢侯置守，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属东郡为阳平县。

汉高祖（刘邦）元年乙未（公元前206年）分天下为十三部属兖州刺史部东郡为阳平县（见方輿纪要）。

东汉光武（刘秀）建武元年乙酉（公元2

5年)分封疆土,仍如前汉(见方輿纪要)。

三国鼎立,魏据中原,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分为十三州,是时属冀州,阳平郡,为阳平县(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属司州阳平郡,为阳平县(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东晋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政区设置因之未变(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南北朝,刘裕改属顿邱郡,元魏复属阳平郡,后齐改曰乐平,后周于此置武阳郡,又析其地置莘亭县(见山东通志)。

隋文帝(杨坚)开皇六年丙午(公元586年)维新朝政,更置郡县,是时属武阳郡复曰阳平,八年改为清邑,十六年于此置莘州,大业二年废莘州,县属魏州,此年改清邑为莘县。又废莘亭县入焉,莘县之名乃始于此(见

太平环字记)。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分天下为十道,莘县当时属河北道魏州,是年复析莘县置莘亭县。五年改为莘州,贞观四年,州及莘亭县俱废,复置莘县。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置魏、博等州防御使。领魏博等州。莘县属焉(见广輿记)。

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时,刘黑闥自贝州反,陷莘州,三月,秦王(李世民)破刘黑闥,尽复所陷州县。十二月获其莘州刺史孟柱(1937年莘县志)。

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末割据势力之延续,政区设置相传皆因唐旧(见嘉靖山东通志)。

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庚申(公元960年)抚有中土,奄定四方,分天下为十五路,属河北东路大名府莘县。(见宋史)。

宋真宗时有一名臣王旦，字子明，莘县人。沉默好学，能任大事，远避权势，不可干以私，尤有德量，相真宗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享有福祿荣名者十有八年，真宗曰：“为朕治太平者必斯人也”。仁宗赞之曰：“可谓全德元老”。卒赠魏国公谥文正，欧阳修为之撰：“宋王文正公碑”，苏东坡为之作“三槐堂序”。旧址名“三槐堂”在城东北二里，旧群贤堡，今移置城内钟鼓楼东，路南有“三槐堂”匾额。（散见正德及1937年莘县志）。

金熙宗大会十六年（公元1119年）悉有中原与宋分疆，置十九路，属大名府路莘县（见金史）。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庚甲（公元1260年）立中书省一，属中书省南部东昌路莘县。（见元史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常遇春兵下东昌，各属归附者甚伙。莘县仍属东昌府（见明史）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元年甲申（公元1644年）属山东布政司东昌府莘县。（见莘县乡土志）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废君主制改为共和制政体，属山东东临道，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道废，直置省府，为山东省莘县。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犯，7月窜过莘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成立莘县抗日政府。1939年初，日寇进占莘县，我党领导人民在边沿地区成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1944年7月莘县城被我军解放，活捉伪县长刘仙州，建立莘县抗日政府。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属



平原省聊城地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属山东省聊城地区，1956年将观（观城）朝（朝城）县北部并入莘县，1958年冬将莘县撤销，除燕店、王奉二区划归冠县外，其余全部划归范县，1961年恢复莘县，又将1958年划与范县，冠县之区域，全部归回，复置莘县。1963年又析范县北部金堤以北之五区，全部属于莘县，是即今日之版图。

## 七·七事变前后原莘县政况简介

姬 洪 九

七·七事变前的莘县是现在莘县的城关、单庙、河店、位庄、燕店公社之全部，俎店公社、十八里铺公社之绝大部，大王寨公社、张鲁公社之东部。共四百五十个自然村，人口十三万三千余，有大粮地六十七万二千七百余亩。所谓大粮地即全县住户的土地，包括宅基场院和荒地；还有一小部分是寄庄地，即外县境户在莘县境内的土地。全县有学田地三千五百〇八亩。学田地中小部分是庵观寺院的土地，俗称庙地；大部分是“贼产地”，传说是清朝时没收历次农民起义军的土地。学田地的田赋归办教育用，故名学田地。属地瘠民贫、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的三等县。

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赶走了奉系军阀张

宗昌的县长刘东海，五月派河南内乡县人马冠三任莘县县长，当年又派浙江杭县人许宝颐任莘县县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先后由潘康国、谢肃烈、吕复阳、王紫丞、焦常荫、张福喜任莘县县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由山东荣城县人董兆晋任莘县县长。一九三一年董兆晋奉命废除里甲及里长，改划全县为六区、九十八乡镇。每区设区公所，置区长一人，助理员两人，录士、庶士、区丁、炊事员各一人。次年，每乡、镇又各置乡、镇长一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废除区长制，撤销区公所，由县直接领导各乡镇。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曲阜王嘉猷任莘县县长。国民党统治莘县的十年间，横征暴斂，敲骨吸髓，官绅结体，狼狽为奸。全县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卖儿鬻女而糊口，至于鳏寡孤独那就更可想而知。地主、官宦之家却过着豪

华奢侈的浮荡日子。诚如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前、统治莘县十年间王嘉猷是最后的一任县长，也是时间最长，办坏事最多的一任

王嘉猷，曲阜城内东门里路北人，地主出身，城南有好地三十余亩，当地群众说城南的地是金银田。有两处宅院，南门里的院里有小楼一幢。王嘉猷从小就生活在剥削家庭里，曲阜二师毕业，有两个太太，原配妻生一子，姨太太生六个孩子。王嘉猷原为山东省民政厅的一般科员，后来以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椿为靠山，又走了考试的过场当了县长。他上任后，首先加强其统治工具，重要部门之首皆换了他的亲信，随之加强县警备大队。县警备大队有两个中队，一个骑兵排，还有公安局所辖警察兵五十余名，共计二百余人。县政府设五科，一科科长张天民，二科科长张我权，三科科长马宜三，兼金库主任，四科科长何有任，五科科长曹

吉云，后换许宜信。公安局局长张吉成。

王嘉猷任期，上至县长及其政府官员，下至府役乡丁、土豪劣绅，各自利用职权吮吸民脂民膏。人们蒙冤受屈到县衙告状，官兵衙役向告状人索取金钱犹如天命，说什么：“大堂上没种着谷子、高粱。”贫苦人民哪有金钱，因此冤屈再大也休想打赢官司。谚语：“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屈死不告状，饿死不作贼。”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泪控诉。“官官相护”是当官的护官符。有钱有势的大人物可以杀人不偿命，可以安脏陷害、嫁祸于人，杀害无辜。全县贫苦民众不知有多少人蒙受奇冤极屈死于非命。

一九三六年春，三个外地人赶着三匹骡子拉一辆马车，住到莘县南关店里。店主李自修发现马车的车箱是二层板，里面是大烟，立即报告了王嘉猷。王派人逮捕了三个毒品贩。贩卖毒

品按当时国民党的法律应枪毙，没收的毒品应销毁。但后来青海马洪奎手谕迅速释放，王慑于马洪奎的势力，没收了毒品，把三个毒品贩子放走。王嘉猷吸毒成癖怎舍得销毁毒品，为了掩人耳目只当众烧掉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匿归己有，得了一笔巨款。一九三六年，王嘉猷续修莘县县志两千部，每部钢洋五元，分派给各乡、镇代售，又搜刮民财近万元。

王嘉猷执法犯法，不仅是个烟鬼，而且是个赌棍，他的姨太太姜淑芳是赌场主，把赌场设在县政府内，按比例抽赢者的钱，用他们的话说谓之“打头”，有时一场就捞现洋几十元，甚至百元。有时王嘉猷正在赌博，有人喊他去审理赌犯，他也要坚持把一盘马将打完再去审讯。还往往在审理吸毒犯时烟瘾上来，就宣布休厅，跑到其邸室吸毒过瘾后再宣布升堂。在审理过程中，拿人命作儿戏。当时有人告发城

西南延营高二给土匪当窝主，王嘉猷立即派人去抓。抓差人到延营便问：“你村高二在哪里住？”延营村的人问：“你找哪个高二？是好赶集的那个高二吗？”（因延营村不只是一个高二，其中有个在集市上当经纪——交易员）抓差人说：“就是他”。于是破门而入，不辨真假，抓起就走。而真正的窝主因闻信逃跑了。到了县衙，王嘉猷亲自过堂审问，高二据理争辩，申明本村不是一个高二，自己没办那种坏良心的事，实在冤枉，请王大老爷调查。王嘉猷不加调查，不辩是非真假，说他拒招供，重刑拷打。这位农民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最后高二哭着申诉说：“我家有八十多岁的父母双亲，如办这种坏良心的事对不起生身父母。你要是不管真假把我处死，年高体弱的爹娘无人照顾。您也有爹娘啊！县长大老爷，我实在冤枉！”王嘉猷脑羞成怒，拍案而

起，随伪造供词，呈请其上司韩复榘批准处死。后来王嘉猷也知道是一冤案。象高二这样的冤案不知有多少起。王嘉猷这个暴徒不知错杀了多少无辜人民，欠下莘县人民累累血债。

王嘉猷到处进行法西斯宣传，声言要学习世界五大怪杰（中国的蒋介石、印度的甘地、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英国的邱吉尔），对莘县人民进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九三五年春，韩复榘唯恐各县镇压人民力量不足，派曹福林师的荣广兴旅来聊城地区清乡（即有名的“荣旅清乡”），荣广兴部的团长史占一率其团之一部奉命来莘县。荣旅清乡名曰，“抓匪”、“抓赌”、“抓吸毒者”，实则是借机搜刮民财，镇压反对地主的贫苦百姓。真正的土匪、烟鬼、赌棍以大量金钱行贿于史团，可以不被抓或抓而获释，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城



西于楼的孙怀玉是个地痞、流氓、土匪头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罪大恶极，被抓获后本应枪毙以平民愤，但被城西一带地主、劣绅用金钱买通荣、史二人，按无罪释放。而他的四个警卫员由于家境贫困，生活所迫给他当警卫，因无钱送，却被史团枪毙。后来李海全任莘县伪县长时，孙怀玉又当了汉奸区长，被我军在北关外大桥上捕捉处决。有钱有势的地主、土匪还可以利用行贿于史团的手段，把自己的仇人诬陷为“土匪”、“烟鬼”或“赌棍”，让史团抓去处死。史团一次就杀了十三人，把头砍下来放在筐里，挂在城门上，名曰枭首示众，以儆效尤。我县不知有多少无辜人民蒙冤被杀，含恨而死。

莘县的国民党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公开，是年九月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莘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为惠迪德、马金钊、孟广荣。一

九二九年一月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莘县区党部，执行委员惠迪德、王汝乾、马金钊、监察委员秦凤箫，候补执行委员为孙钦明、孙淇，候补监察委员李增鼎。一九三〇年四月，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直属莘县区分部，执行委员为惠迪德、王汝乾、孙钦明，候补执行委员相其昌、段继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又一次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直属莘县区分部，执行委员为惠迪德、孙钦明、段继业，候补执行委员王汝乾、相其昌。一九三三年七月，再次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直属莘县区分部，执行委员为惠迪德、孙钦明、周景诗，监察委员王汝乾，候补执行委员李培钦、隋延庆，候补监察委员秦凤箫。莘县的国民党也和全国的国民党一样，其内部争权夺势，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为非作歹，挑辞架讼，还声言破除迷信到处拆庙拉神，籍以索取

财物。他们并到处抓劣绅，待他们所抓的劣绅送厚礼后，又奉称为社会贤达。莘县的国民党主要分为惠、段两派，惠把持党务、政界，段把持教育界。惠的靠山是山东国民党头子张维邨，段的根子是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但他们反共反人民是统一的。莘县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称之为“刮民党”。甚至有些开明士绅也深怀不满，把国民党员视为“小孬种”。山东军阀韩复榘和蒋介石闹内讧，韩复榘视各县国民党分子为动摇其江山的力量，于一九三六年春毅然下令全省各县县党部全部停止活动。

韩复榘为了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长期霸占山东，特聘请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来山东，分别在邹平和济宁办了两处“乡村建设研究院”，贯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即政教合一，乡村自救，保家卫国）。通过乡村建设研究院培训乡农学校的校长、教育主任、军事主

任、指导员。接着在全省各县相继建起了乡农学校，以培训地主武装，镇压人民群众。莘县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办乡农学校两处，分别设在城西北燕店和城南田集。每处设校长、教导主任、军事教练、指导员、事务员各一人，下设四个班长，还有勤务、炊事各一人。全县各区公所已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全部撤销，这时由乡农学校直接领导各乡镇。我县田集、燕店两处乡农学校分管南、北各半个县的政务、军事和教育。乡农学校的校长负责全面工作，权力很大，教育主任负责教育，军事教练负责军事训练，指导员负责文化课，事务员负责食宿，四个班长都是县政府的士兵。两处乡农学校开始都是复训的联庄会会员，时间一个半月，每处五十人，两处共训一百人，后来办自卫班，训乡农学校正式会员，每期三个月，每处五十人，两处一百人。办了两期，两处共训二百

人。连同复训的联庄会会员共计训了三百人，第二期自卫班，因七·七事变，国民党二十九军惨败而解散。乡农学校的学员都是各乡镇中具有土地最多的地富子弟，枪支都是自带的。韩复榘举办乡农学校的目的，是扩大武装力量，这些乡兵（人们称乡农学校的学员为乡兵）经常打着抓赌、抓匪的旗号到乡村中敲诈勒索，胡作非为。他们明目：“抓赌”，实则抢钱；名曰“抓匪”，实则是抓反对地主的贫苦百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华大陆，这位大肆宣扬学习世界五大怪杰、高唱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王嘉猷吓破了胆。据八十二岁的退休老教师王少山谈，一九三七年十月，王嘉猷听说日本占领了德州，就惶惶然迫促着全县官佐士兵，携带着巨款及金银珍品向南潜逃。走到东

阿，又怕没有撤退命令而撤退被韩复榘问罪，于是改变主意坐船去济南。在临渡前对其部下讲：诸位，现倭寇入侵，中华危机，吾第进退维谷。小弟本想率大家去河南暂避，又怕韩主席问罪。故此，诸位愿回家的，发给五块钱作路费用；愿随我去济南的，船已备妥，便去济南。当时有一半人员回家，一半人员去济南。王嘉猷赴济南后，不几天又回到莘县。可是去济南的其他人员被韩复榘的军法处查获，按潜逃犯扣压七天方放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二十九军残部南撤路过莘县。王嘉猷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决计潜逃。七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赵仙如谈，王嘉猷逃跑前责令三科科长兼金库主任马宜三打开金库，将库中之公款抢劫一空，马宜三也乘此混乱之机窃取一部分逃之夭夭了。马宜三是莘县有名的劣绅之一。当时

莘县人民流传着：打城不打城，权在吴鼎铭；叫过不叫过，权在魏大磨；上捐不上捐，权在马宜三；完粮不完粮，权在杨贞祥。王嘉猷带着县警备队和在同农学校受过训的地主子弟约五百余人仓惶南逃。至寿张县黄河南北岸全部跑光了，就连他最亲信的公安局局长张吉成也溜之乎也。王嘉猷视此况不妙，火速带着身边尚有的三个乡亲，满载莘县人民的血汗——金银珍品及钞票，还有手枪两支，手枪一支，他驾驭着三轮摩托，他的三个乡亲各骑脚踏车逃回老家曲阜了。

王嘉猷逃跑后，莘县土匪肆起，司令如毛。地主劣绅乘此搜刮民财，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城北有周发皋、杨在田，城西有刘建唐、孙怀玉，城西北有马建唐、耿朝良，城南有魏雪桥、魏书芬，城东有马金璧，他们各霸一方。每天不是这股土匪来要粮，就

是那个所谓民团去要款，闹得全县人民终日惶惶不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冠县籍土匪头子韩春河，自称西北风，率土匪七百余名，占据莘县城十余日。韩春河占据莘县期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放火烧了县政府和监狱。

韩春河走后不几天，劣绅魏雪桥带领地主武装五百余人进入莘县城，自称是莘县民选的代理县长。魏雪桥是城西南马厂的大地主，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继续向人民敲诈勒索，派粮、派枪、派草料，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

一九三七年初冬，日寇占领了德州入侵鲁北。韩复榘命令聊城专员范筑先撤黄河南。范筑先目睹了遭受国民党败兵抢劫，人民流离失所的凄然景象，坚定地说：“我坚决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占领了临清、高唐、大名等城镇，韩复榘第二次命令范



筑先撤退。抗日英雄范筑先以个人的名誉，向全国发出了“……裂目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随之，范老英雄遴选年青共产党员吕世隆来莘县任抗日县长。那时，莘县的局面相当混乱，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终日盼望救星。

吕世隆是山东省泰安县荆店公社吕庄人，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来莘县上任以后，在范专员和中共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首先整顿社会秩序，扩充武装，恢复政权，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政令。在县政府工作中吕世隆县长的得力助手是秘书刘泮溪。刘泮溪秘书是山东寿光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一九三八年初建立了县大队，吕世隆县长兼任大队长，副大队长是中共党员晁苏民，政治部主任是中共党员警秀林。大队所辖三个

连，一连连长刘建唐，后换中共党员曹斌，指导员宋子光；二连连长马金壁，指导员马兴堂；三连连长张际超兼公安局局长，指导员陈瑤璞。宋子光、马兴堂、陈瑤璞均是共产党员，马兴堂是叛徒，后被我枪毙。同时，在全县六个区都建立了区公所，每区扩充区队五十人。各区所驻地，均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旧址。一区在武庄，区长刘连生；二区在姬家，区长武寄岳，后换中共党员曹学士；三区在燕店，区长杨学文；四区在大索庄，区长武铭扬；五区在大宋庄，区长窦玉琛；六区在黄楼店，区长魏书芬。接着组织莘县农民互助会，在贫雇农中吸收会员，再由其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并推选了在莘县颇孚众望的中共党员王惠卿同志任会长。王惠卿废寝忘食，昼夜奔波，迅速在全县六个区成立了区农会。全县百分之八十的村庄建立了农民互助会组织，各

村还成立了自卫队，站岗放哨，查捕汉奸。当时莘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乡村城镇抗日的标语张贴满墙，抗日的红旗四处飘扬，抗日的歌声传遍四方。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歌唱新生活，歌颂共产党。莘县的农民互助会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是办得最有成绩的，各兄弟县都派人来学习。一九三八年夏（时间说法不一），在莘县城里东北大广场上，举行了有五六千人参加的检阅示威大会。来自全县六个区的会员们，扛着红缨枪、大刀和铡刀来参加。这是莘县历史上空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大会，吕世隆县长和王惠卿会长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大会对全县顽固分子威慑很大，对全县人民是莫大鼓舞。

一九三八年四月，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吕世隆县长兼主任，中共党员张炳元同志任秘书长。张炳元是河北

胜芳镇人，南开大学学生，学识渊博，作风正派，平易近人，被誉为“张大姐”，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訾秀林、王惠卿分别为组织部正、副部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宣传队相继成立。仅五月份，就在农民互助会中发展了一百多个党员，使革命的种子在农民群众中扎下了根。同年，在莘城东街和燕店建立了两处抗日完全小学，建了初级抗日小学八十一个班。教育科长是中共党员苏群，东阿人，东北大学的学生。督学是中共党员冯子华，寿张乡师学生，是当时莘县县委宣传部长，工作很积极，群众叫他“跑烂鞋”。

县政府还成立了人民来访处，吕世隆县长定期亲自接待，为农民排解纠纷，此后又发动群众开诉苦会，斗争恶霸地主。在当时，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措施。莘县的人民群

众无不称赞这位年青的抗日县长。吕世隆县长办事认真，对上级交给的任务都能及时完成。范筑先专员曾几次向同事们称赞吕世隆县长是个“抗日模范县长”。

一九三七年春以前，传说莘县只有三个共产党员，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十一月成立了政训处，莘县共产党员获得了活动的机会。一九三八年春节，成立了中共莘县县委会，李济安同志为书记，不久又由陈尚文同志接任。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西北各县重新成立了国民党组织。莘县成立了以惠迪德、孙光远为首的国民党区分部，挂出牌子，招搖撞骗，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团体进行破坏。

当时共产党对外尚不公开，但是党领导的莘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其他抗日救亡团体都挂出牌子，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吕

世隆同志任莘县县长期间，同国民党莘县区分部和地方封建势力作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吕世隆同志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使顽固分子心怀不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攻陷聊城，范老将军殉国，王金祥继任聊城地区专员。在李树椿、王金祥的策动下，惠迪德、孙光远伙同刘建唐、张际超、马金璧等反动分子阴谋杀害我抗日县长吕世隆同志。十一月十六日，反动分子散布日寇已越沙镇西南而来的谣言，企图杀害吕世隆于撤离途中。吕世隆同志认真分析敌情，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应付危局，本人屹然未动，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接着召集张炳元和王惠卿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请十支队立即派兵支援。由张炳元执笔给张维翰司令写信告急，派农会副会长中共党员白璞送去。恐路上遇到意外，接着又写一信，派冯子

华同志送去。张维翰司令接到告急书信，立即派骑兵排来莘县救援。

十一月十七日，惠迪德、孙光远、刘建唐、张际超、马金璧密谋后，刘建唐、张际超、马金璧带其爪牙十余名借口索饷闯进县政府。张际超首先向吕世隆县长开了枪，刘建唐也接着击了一枪。吕世隆同志壮烈牺牲于县政府办公室，倒卧在血泊中，终年二十八岁。城里的老百姓听说吕世隆县长被打死，悲痛万分，泪流满面，又听说敌人快来到啦，于是男男女女抱着衣物向西门方向奔去，街上顿时象滚了锅一样。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悉吕世隆同志牺牲的消息，无不为之悲痛。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杀害吕世隆同志的罪魁祸首刘建唐、张际超、马金璧都先后受到应有的惩罚。张际超当了汉奸中队长，在抗日战争中被我军阵毙。马金璧于四六年在莘、阳

边区一带勾结一伙土匪自称为莘县县长，被我军击溃后又跑到济南当了莘县“还乡团长”，全国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枪决。刘建唐当了汉奸，后来潜逃上海，全国镇反时被我政府逮捕，在狱中畏罪自杀。惠迪德、孙光远下落不明。

莘县城解放以后，人民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们，于一九四六年一月把莘县文庙改建“烈士祠”，把吕世隆同志入祀烈士祠的首席。同年，又在西关厢创办了一所“世隆小学”，莘县药社改为“世隆药社”，县酱园改为“世隆酱园”，昭示这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捐躯的年青共产党员、莘县第一个抗日县长的不朽功勋。

敌人杀害吕世隆县长以后，妄图再杀害刘泮溪秘书。当时，刘泮溪秘书正领导着县清乡委员会的全体同志在二区区公所所在地姬家进行



着清乡工作。敌人打着吕世隆县长的旗号向刘泮溪同志去电话说：“县里有要事，速回来。”适此时，天已黑，张维翰司令所派十支队骑兵排约五十人已抵姬家。负责同志向刘泮溪秘书谈了情况后便驰聘莘县而来，待来到时城四门均已落锁，并听到城内有零星抢声、乃折返姬家。到后立即缴获了吕县长所派保卫清乡委员会的二连冯连科排的抢枝，随带着冯连科及全排士兵，保卫着刘泮溪秘书及其他同志朝西北冠县方向急去。至冠县桑阿镇，发给冯连科及被俘的全排士兵每人十五元放回。这伙顽固分子还钦禁了张炳元、訾秀林同志，因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才释放。其他同志在城内群众和本地干部的掩护下，均脱险。

吕世隆同志被害后，莘县的第一个抗日政府被破坏，白色恐怖重又笼罩着莘县。我上级党委鉴此情况决定由王惠卿同志任县委书记，

杜东河同志任组织部长，张英同志为宣传部长，继续领导着全县党员坚持斗争，并大力发展党员，扩大抗日力量。

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以后，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分裂。王金祥把范筑先改编的抗日支队编成沈鸿烈系统下的保安旅，公开进行反共活动。同时，莘县杀害吕世隆同志的几个凶手到朝城向王金祥报功，王金祥随派魏履坤来莘县任县长。魏履坤是个死心塌地的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国民党莘县区分部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狼狈为奸。他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陈词滥调，反动透顶，胡说什么：“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中央政府）。哪来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怪战！”还说什么：“要想抗日，必须维护地方治安。”实际上，这是蒋介石

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翻版。他上台后就带着他的反动武装，打着维护地方治安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血腥镇压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誓与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为敌。

我党领导的十支队为了纪念范筑先将军改名为“筑先纵队”。十二月初，张维翰司令派筑先纵队之一部，挺进聊城县境打击敌人，路过莘县。魏履坤得息后报告王金祥，王金祥立即派其二支队在莘县北关围攻我军。开始我军为顾全大局不予还击，但顽军仍然猛烈攻击。我军随撤至北关大庙，顽军又将大庙团团包围。我军为了自卫予以还击，但寡不敌众，边战边向北撤退。退到河店村北大庙院内，又被顽军包围，随之展开血战，经过一夜激战，我军受到很大损失，继续北撤。魏履坤为彻底消灭我军，派国民党员刘世范去下令二区民团团长周发皋率其团兵在杨楼村南大庙截击，妄想把我

军消灭在杨楼大庙一带。当时周发皋有常备队五个班，约五十人。其中有三个班的班长阎广才、杨文华、张玉书是我姬家中心支部打入的共产党员，在此紧急关头，县委宣传部部长张英同志速去姬家，告诉我说：“我军被顽军追来，先头部队已至郭家村后，马上告诉我党的三个班长，争取周团不要截击。”那时我是姬家中心支部书记，便立即召开三个班长开会，传达县委指示。三位同志同声回答：“坚决执行县委指示！我们拿党籍作保证！”随即我又到团部（驻姬家）找周发皋做工作，说明截击与不截击的利害。周说：“我听你的，我团不参与此次战斗。”接着，刘世范来找周发皋，说明县长命你团在杨楼一带截击一股溃军。因周已被我说服，主意已定，随对刘世范说：“这是国共两党的事，我们管得了吗？”刘说：“他们是共匪！”周又说：“我家有二百多亩

地，六处院落，你家二十多亩地，几间小破房子，你怕啥！以后要是共产党来烧我的房子，抓我和家里的人，你有办法吗？”刘说：“你害怕共产党，我不怕，把团长让给我，我指挥打。”周说：“我这个团长是二区各村长推选的，等以后选着你，你再当家”。刘无奈而去。接着，周发皋召开五个班长开会，进行了安排。我军退至杨楼大庙一带时，有先头部队喊话：“我们是范老将军的部队，是打日本的，请借给我们一条路用。”杨文华同志喊道：“我们是民团，没别的，一定借给你们路用，请放心！”待我军过后，周发皋命团兵对空鸣枪，以应付县长的命令。顽军追到，我军已安全撤至冠县境内。顽军追到二区所在地姬家，不敢继续追击，速撤回。这就是莘县人民至今还话传着的“河店血战”。一九三九年夏，周发皋被我卫河支队捉住，莘县县委向卫河支队

的郭英司令回报周发皋对此次战斗是有功的，遂被释放。

一九三八年除夕，日寇对鲁西北进行大扫荡，魏履坤对日本侵略军如见猫之鼠，一枪未还，率县大队弃城南逃。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初四汉奸刘仙舟带领四百余伪军配合日军一个中队进了莘县，当了伪县长。

这篇文史资料涉及到的一些情况距今时间较长，当事者大都去世，健在者也年岁已高，且身欠佳。在搜集过程中，王少山、沈杰臣、赵仙如、曹良如等几位离休老同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搜集的材料很不全面，甚至有些出入，加之本人水平很低，一定存有不少问题。请知情之长者指正，恭静候。

# 里应外合 智取莘城

曹丕堂 范永堂

## 一

一九四四年夏季，抗日战争形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军从战略相持，逐渐地转向战略反攻！为了给大反攻创造条件，冀鲁豫军区七分区决定，发动全区军民进行一次较大的战役，给敌人以重创，扩大根据地！分区首长和地委领导同志几经研究，确定先解决莘县的敌人。

莘县在鲁西北重镇聊城的西南方，县城距聊城九十余华里。盘据聊城的日伪军把莘县看作是“南面屏障”，“不可失去的一臂”，经常派一个中队的日军据守。直到我军解放莘县的前几天，尚有两个小队日军在莘。盘据莘县

的伪军头子刘仙洲，任伪县长兼保安司令，是日本人一九三九年从青島调来的鉄杆汉奸。一九四四年春，他手下所辖伪军已有十七个中队，外加特务队、新民会、警察局、新兵集训队等，共约三千余人。莘县城外炮楼星罗棋布。城牆外设有鹿寨、鉄丝网、环城壕沟等多道障碍。莘县县城虽是平原城镇，但四个高大的门楼牢锁四关，城内有古塔、魁星楼两座高大的建筑物俯控全城。城内兵多弹足，粮秣充裕。总之，莘县城当时是易守难攻之地！虽然莘城敌人戒备森严，攻取不易，但也有有利条件。早在一九四一年春，我党就向城内派去了范永堂等地下工作人员。几年来，范永堂等同志在莘县、朝城两县敌工站及军分区敌工科的领导下，除给我军送出了大量的情报外，还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同时，又争取了百余名伪军官兵，同意起义反正。一九四四



年春，范永堂三次出城，向分区赵健民司令员详细汇报了莘城内的情况，分析了组织伪军起义，内部策应解放莘城的可能。为了更确切地了解城内的情况，赵健民司令员又派二十二团参谋长刘墨卿跟随范永堂进城侦察，绘制地图。我方对莘县的情况有了清楚的了解，战役便开始具体部署了！

七月中旬，分区和地委在距莘县城西南方向三十多里的程营村为解放莘县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司令员赵健民、政治部主任于奕虹、敌工科长杨大伦、准备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十二团长赵鹤亭、副团长曹丕堂、政委靳毅、参谋长刘墨卿等同志，参加会议的还有军分区直属基干团、马颊河支队、分区所辖各县县大队和莘县、朝城敌工站的领导同志以及莘县邻县的县委书记、莘县部分区委书记等。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解放莘县县城的作

战方案。散会前，作战参谋向有关单位分发了作战地图，明确了各自的具体任务，对战斗开始的时间、联络信号、各路人员集合地点、行军路线、我方人员识别标志、联系口令等有关作战的具体事宜，都作了具体而周密的布置。散会的时候赵健民司令员把二十二团的几个领导同志和范永堂留下，做了特殊的安排。

二十二团和分区基干团，按军分区的特殊安排，要公开地搞大练兵。这着棋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解放莘县的作战方案虽然是智取、夜袭，但是还要准备强攻；第二，可以迷惑敌人。莘县的敌人发觉我们大练兵，会认定我们强攻某地，只注意常规戒备，这样可减轻莘县城内我地下工作的压力，为伪军起义创造条件。

二十二团和分区基干团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有的胳膊练肿了，也毫不在意，继续练下

去；有的负了轻伤，仍不退出练兵场。练兵场上，龙腾虎跃，人喊马嘶，一片紧张而热烈的景象！

## 二

范永堂参加了程营会议，当夜未能回到城里。次日黎明，伪军司令部有事找范永堂，没找到他；一中队派人到范永堂家里去叫，又扑了个空。幸亏范永堂以到外村看病为由，早有安排。他回到城里必须装几天病，以掩人耳目。

范永堂“养病”，就住在莘县古塔的第五层上。对外说是养病，实际上他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处理急需办的一些事情。有利条件是，这座古塔早就变成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聚会场所、联络地点和指挥中心。这座古塔是宋代建筑，高约十几丈，塔内台阶可通顶端。每层四面有小门，最上层可容十人，底层可容

纳百余人。这是一座多层碉堡，又是极好的瞭望哨所。汉奸司令刘仙洲对古塔特别重视，派一个加强班日夜住在塔上，并设电话直通司令部。范永堂进城不久，就注意到了古塔的军事意义。他从侧面了解守塔班班长赵缙绅的来历，接着又用亲戚关系和赵缙绅挂上了钩，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把赵缙绅培养为党员，赵又说服了全班伪军同意起义反正。这座俯控全城的古塔，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我党控制了。

预定我军攻城的前一天，范永堂还有一些要事需办，因牵连的人多，又不能用开会的形式解决，必须亲自去办理。因为在这个时候保密工作特别重要，稍有疏露就会危及全局。

吃过早饭，范永堂骑着自行车出了城。他的任务是把二十二团的四个侦察员领进城来，最后核对军事地图上的地标地物和敌人的军事

布置，同时还要运进一部分手枪，方便起义的头头们和联络员使用。范永堂在预定地点找到了二十二团派来的侦察员。他们在一起合计了一阵儿，范永堂找熟人借来了独轮车、扁担和筐，又买了一堆大西瓜，把手枪藏在筐底，用西瓜和瓜秧伪装了一番。几个侦察员化装成卖西瓜的，范永堂推着自行车随后，他们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城门走去。一、二道岗哨都是早安排好的我地下党员，顺利通过。第三道岗虽是铁杆汉奸值班，但范永堂早已安排刘西祥来接。刘西祥是县长刘仙洲的侄子，他仗着叔父的势力，吃喝玩乐，游游逛逛，没人敢挡。范永堂在两年前就和他结成了“拜把兄弟”，借刘西祥这棵隐身草，范永堂得到出入刘仙洲住处的方便，久而久之，刘仙洲也就把范永堂视为知己。特务队几次对范永堂提出怀疑，都被刘仙洲否定了。今天范永堂领人进城，有了

刘西祥就算有了特别通行证。进了城门，范永堂送给刘西祥一挑子西瓜。

范永堂还没走到古塔跟前，就见守塔班长赵缙绅慌慌张张迎上来，小声告诉：刘仙洲要守塔人员换防，原因不明。他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心里暗想：莫非里应外合解放莘县的计划泄露了秘密？可他冷静地一想，日军昨夜撤走，伪军原驻防不动，刘西祥刚才心情坦然，便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这时，他想起自己发动起义的人员多在一中队，眼下中队还在城外担任巡逻任务，急需调进城来。他觉得，应该马上去见刘仙洲，探明虚实，见机行事。打定主意后，他便安排赵缙绅接待几个

“卖西瓜”的侦察员。把手枪藏在城内几个关系户家后，他就到伪军司令部去了。

范永堂见到刘仙洲，两人一边吃西瓜一边闲扯。由此，他断定刘仙洲对我军的意图毫无

所知。说话间，他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假请报”递给刘仙洲，刘仙洲见和特务队、新民会搞的情报大同小异，对他就更加相信了。范永堂见时机已到，便问及守塔班换防事。刘仙洲原来想把新民会的一伙大烟鬼弄到塔上去，才让赵缙绅班撤下来，别无他意。范永堂装做献计，以加强防守为名，劝刘仙洲不要撤赵缙绅班下塔，并把一中队调进城来，加紧防守西门和北门。刘仙洲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当即派范永堂去传达他的命令。范永堂达到了目的，就匆匆离开了伪司令部，并派交通员吴明赶往赵健民司令员处汇报情况。

范永堂忙完了几件大事，又回到古塔上，思索着下几步棋的走法：怎样召开党员会；一百多名起义人员如何组织；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怎样分工；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如何指挥；怎样搞通讯联络等等。

就在范永堂紧张而繁忙地工作时，城外的攻城部队和参战人员也紧张而繁忙地行动起来了。除了二十二团以外，各个部队和参战人员都按原计划走向预定地点。分区机干团分成多股，向城北门和聊莘公路隐蔽行军，本来速度很慢，来了一场雷阵雨，他们借风雨声掩护，一个“冲锋”就进入了目的地。

二十二团列队经过张鲁镇，在张鲁镇南大场里，由赵司令员作战前动员报告。之后，大队人马毫不隐蔽地向东南朝城方向进发了。当时，不少人闹不清真实意图。其实，二十二团作动员报告的地点和行军路线都是分区首长特意安排的。张鲁镇是莘县城正西方向三十里的一个回民大镇，镇上刘仙洲的特务队日夜不断，新民会的密探常来常往。二十二团大队人马齐集张鲁，那就是要向敌人暴露目标，部队向东南进攻，意在声东击西。



天全黑的时候，二十二团前锋已经渡过徒骇河。吃过晚饭，把解放莘县城的作战方案传达到了战士，并且讲明了迂回行军的意图，明确了各单位的具体作战任务，队伍向后转，原来的后卫成了前锋。每个人都做了战斗识别记号——左胳膊缠白毛巾，在夜幕的掩护下穿过青纱帐，向莘城进发。

就在二十二团向莘县城快速挺进的时候，分区基干团之一部，已经秘密潜伏在莘城北关外的城墙根下。聊城至莘县的公路已多处挖断，且埋了地雷；通往莘城的电话线路上，民兵已爬上电线杆，一声令下，便剪断电线；包围城外碉堡的部队、民兵已经进入阵地；救护队、担架队已到达预定地点待命……。

### 三

因进攻部队二十二团绕道迂回，临时遇雨，增加了行军的困难，部队到达莘县城外的

时间推迟了。

范永堂灌醉了一中队长，最后完成了策应部队进城的准备工作。他坐在西城门楼上，两眼盯着城外不远处的土地庙（那里是赵健民司令员攻城的联络处）。早已约定，部队一到城下，便用火镰火石打火和城内联系，城内用手电照明回答。预定时间到了，范永堂看不到一丝火星，他一边猜测，心里不住地打鼓：眼下已经扣压了三队巡逻哨了，过不了多久，伪司令部从巡逻哨不按时返回原地，就会判断出发生了意外，时间不能无限制地拖下去。集中在西门和北门的起义人员，比较沉得住气，可另有一小部分人，分散在保安队、特务队、新民会等处，这些人心里有些慌。他们不时派人到西门来问范永堂，要不要采用第二套方案（杀死哨兵，西门集合，拉出城去）？范永堂为了预防万一，下达了准备采用第二套方案的命

令。

范永堂两眼瞪得流泪，凌晨三时，终于盼到城外的火光，一连三下，接连三次。他一边下令发信号联络，一边命令开城门。开门的是两个人，一个跑下城墙，开城门洞里的大铁门，一个要拽着拴在城墙垛子上的绳，溜到城墙外去开护城河的木栅栏门。“吱呀呀”一声响，护城河边的木栅栏门打开了，战士涌到城门洞前。大铁门一时没打开。在这紧急的时候，曹丕堂副团长下达了按第二套方案攻城的命令。战士们有条不紊的沿城墙根向左右散开。抬云梯的战士冲在前面，每架梯子做为一组，拉开一定距离，挖坑定根。用绳子拉梯子的，用特制的杈子举梯子的，各负专责。刹时，十几架云梯在城门楼附近架起来了。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沿云梯向上爬，曹副团长和参谋长刘墨卿也随第一梯队登上了城墙顶。范永堂一见

城门打不开，心里急得象着了火，亲自跑到城门洞里去开锁。原来派去开锁的人太慌，把枪探条配制的钥匙用倒了。范永堂同志打开锁，抬走顺门杠，战士呼呼啦啦从门洞里涌进城来。他同赵绪绅一起在预定地点找到了分工夺占伪司令部的二连。

范永堂和赵绪绅同志带着二连，从小胡同里悄悄地向南行进，边走边和连长赵智歧议论着作战方案。不一会儿，他们已出现在伪司令部所在的南大街上。战士们用一座石牌坊作隐蔽，干掉了两个游动哨。按刚才商定的对策，战士们一路纵队贴着伪司令部的南墙根隐蔽前进，范永堂、赵绪绅和赵智歧三人则走在街中央，大摇大摆地走向伪司令部。伪司令部门口的两个门岗，听见脚步声，看见三个人影，慌忙把枪一横，喝问口令，范永堂对答如流。哨兵认为是自己人，放心地又把枪背到肩上。说时

迟，那时快，范永堂和赵缙绅猛扑过去，一人对准一个，用手枪照两个哨兵的耳鬓狠砸。两个家伙连叫都没叫一声，就象两捆秫秸似的倒了。二连长一挥手，贴墙隐蔽的战士们飞速跟了上来。带班班长听见动静，手举马灯从传达室出来，他刚想张口，几支刺刀同时捅进了他的胸膛。东边的一所大房子里，值夜班的伪军正在打麻将，只顾吆三喝六。连长一挥手，四、五个战士冲进去，大吼一声“缴枪不杀！”这群废物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范永堂带着二连战士穿过庭院，到了伪司令部后院，他指着房子的西端说：“刘仙洲在亮灯的山房里！”说完，同赵缙绅一起，向西院的伪参谋处跑去。

范永堂和赵缙绅跑进伪参谋处大院，见一个汉军兵扛着机枪，已经爬到梯子的半腰。范永堂明白，机枪一上房，会对战士造成严重伤

亡，枪声一响，还可能破坏我军的作战计划。眼看那家伙正要跷腿上房，范永堂疾步朝前，双手扳梯狠劲一拉，梯子倒了，那个家伙连人带机枪摔出几丈远。这时，值班的伪参谋长在屋里喊叫起来。范永堂朝赵缙绅使了个眼色，赵缙绅贴在门边大喊：“快，马参谋长，有情况！”这个家伙端着手枪就往外窜，范永堂一伸腿，把他绊了个狗抢食，两个扑上去，用手枪照脑袋猛砸几下，把个恶贯满盈的汉奸送上了西天。

再说刘仙洲，他得到我二十二团经张鲁开往朝城方向的消息后，自以为高枕无忧。当我军从西门涌入的时候，他还在睡梦之中哩！他住的外间房亮着一盏马灯，两个警卫员都睡着了。战士推门，门上了栓，二连长示意用刺刀拨门栓，又拉过来四个战士，做撞断门栓紧急攻入的准备。门栓被拨开了，我们轻轻地推开

房门，两个警卫仍在熟睡之中。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把刘仙洲惊醒，预感到情况不妙，翻身坐起，刚想喊勤务兵，就见蚊账被四、五把明晃晃的刺刀挑开了！可笑“模范县”的堂堂县长，只穿条裤头，就当了我们的俘虏！

天色微明，二十二团已全部攻入城内。分区基干团早已巧夺北关，顺利进了城，正按预订方案展开。这时，北街、西街、中街的全部，南街的一部分，伪军司令部、伪县政府、警察局、新民会等处，未发一枪，已被我军夺占。这么多部队进了城，响动难以避免，行踪也难以完全隐蔽。据守南门的伪军和住在东街原日军司令部里的保安队、特务队发现了我军，开枪抵抗，我军当即开枪还击，于是枪战开始。

赵健民司令员派曹丕堂副团长去南街指挥，消灭南门上的顽敌，自己亲自到东街观察

情况，并把指挥部移到古塔底层。

曹丕堂同志到了南街，命令机枪射手对南门进行火力侦察。他弄清了敌人的虚实以后，把几个连排长叫到跟前，交代作战方案：用两个排借民兵掩护，先夺占魁星楼，切断南门和东街敌人的联系，并从东侧威胁南门敌人。对南门守敌，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通知城外的马颊河支队组织攻城，以达到吸引、分散敌人火力的目的。突击队乘敌人腹背受攻之时，从两侧切近，迅速结束战斗。连排长们议论了一下方案，明确了战斗任务，各就各位，立即行动起来。

当我军对南门和魁星楼发起攻击的时候，我二十二团一部和分区基干团的主力正和敌人在东街展开巷战。经过激烈地厮杀和争夺，我军夺取了大部分民房以及大型建筑物文庙，把敌人压缩在原日军司令部大院里。这个大院子墙



很高，四角碉堡上的火力互相交插，互相策应。为避免伤亡，我军暂停进攻。

古塔下，赵健民司令员召集会议，研究消灭东街顽敌的作战方案。他细心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又向刚赶来的曹丕堂同志询问了南街的战斗情况，最后他讲了消灭东街顽敌的方案：在大院北隅，利用文庙房脊这个制高点，进行火力盖帽。主攻方向在西面，敌碉堡向西的每个枪眼，要用机枪封锁。用大量的手榴弹制造烟幕，突击队利用烟幕用炸药包先搞翻一个碉堡，以后就好办了。攻击时间在南门结束战斗之后，使东街之敌在北、西、南三面受到威胁，我军对其形成新月形包围之势。经过讨论，确定由刘墨卿参谋长组织突击爆破，曹丕堂副团长组织火力掩护，赵鹤亭团长到城外指挥收口袋拉网。歼灭逃窜之敌。散会后不久，魁星楼和南门即被我军占领。接着，总攻东街

的各路人马，相继准备完毕。一声令下，总攻号声响了起来！

文庙房脊上十几挺机枪齐射，组成了密集的火网，盖住了敌人盘据的大院。民房顶上，几十挺机枪也一齐吐出了长长的火舌，子弹象疾风暴雨，向敌碉堡倾泻下去。敌人西边的两个碉堡，全被打哑了。突然，一个机枪手挂彩了。曹丕堂同志气得火冒三丈，呼的一下扒了上衣，光着脊梁，抓起机枪猛扫起来。一声短促的号响，几十颗手榴弹同时朝一个方向飞出，转眼间手榴弹爆炸起一片浓烟。爆破组的战士们，冲过烟雾，接近敌堡，烟雾尚未散去，就听见两声巨响，西边的两个碉堡同时飞上了天！盘据在大院里的敌人见势不妙，开东门狼狈逃窜。我军战士大声喊叫，并不追击。在机枪步枪齐射下，敌人仓惶逃命，死伤惨重。逃出东门之敌，自以为侥幸，但他们那里

知道，埋伏在东门外的部队和民兵，早已布下了罗网……

日上三竿，莘城内的枪声停止，解放莘县城的战斗宣告胜利结束。紧接着，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向城周围的炮楼展开。

就在我军与敌人鏖战的时候，军分区敌工科科长杨大伦，莘县敌工站长宋雪峰等同志，正对被俘的刘仙洲进行政策攻心。刘仙洲对我军的俘虏政策早有了解，也预料到莘县惨败，日本上司不会轻饶，眼前只有立功赎罪，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按照我敌工人员的意旨，刘仙洲对城外每个炮楼上的伪军都写了劝降信。当天，赵司令员和基干团押着刘仙洲到燕店和西吴庄两个据点喊话，迫使五个中队的伪军投降。其他炮楼上的伪军，被我军和民兵重重包围，他们见了刘仙洲的亲笔信，看看阵势，不敢顽抗，也纷纷投降。

这次战斗在几小时内解放了莘县城，不到二十四小时便荡平了莘县全境的敌军，迎来了八月一日的黎明。日伪军多年惨淡经营的“模范县”土崩瓦解！近三千名伪军，除毙伤一少部分外，大部被俘，漏网者很少，而我军伤亡，总计不过十人！这次战斗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布匹等。这就是当时闻名鲁西北的莘城大捷！

##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属部 盘踞我县古云集一带的罪行

政协莘县委员会文史组调查整理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原为第十军团，总司令是石友三，下有两个军、一个教导师。一个军的番号是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兼，另一个军，军长是高树勋，群众称为高军。教导

师的师长是石友信，副师长是文大可，号称劲旅十万人，实有乌合不及四万众。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石友三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并将高树勋部调到鲁西濮县、观城、范县一带，为了粉碎顽军的进攻，我军在宋任穷指挥下，进行了冀南讨逆战争。一九四〇年二月，石友三部遭我军痛击后窜到清丰、南乐、两濮地区，与高树勋部会合。不久，因屡受我军痛击，被迫放弃观城县县城及附近一带的几个据点，将其全集团军的驻区也进行调整。调整后，石友三及其总部各机关盘踞濮县（今属河南省范县）城内。石友信率教导师一部盘踞四关厢，文大可率教导师另一部盘踞濮县周围附近村庄，高树勋军盘踞河南的濮阳县东北约五十华里的刘下屯一带。六十九军一部盘踞我县古云集（原属山东濮县）附近的几个村庄，另一

部盘踞濮县的白衣阁（今属河南范县）一带。

石友三，初在冯玉祥将军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委任为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〇年秋，石友三为蒋介石既不补充枪支、弹药，也不委任地方行政长官故，十分恼火。随秘密召集亲信共谋对策，经反复磋商，一致认为这仍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惯伎，只有公开投降日本军，方能保存和发展实力，掌握了实力才可待机谋大业，最后议定马上派日语秘书王醒华①去北平，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头子王揖唐及日寇侵占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呈递卖国求荣书。因要求的条件过高，王醒华虽往返三次未能得逞。高树勋原来是蒋介石的监视石友三的大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随通过军统电台报告蒋介石。一九四一年春节后，蒋介石下了迅速杀掉石家兄弟的命令。高树勋便和汪健②商定，沿用鸿门宴的计策，将石友三、石友

信骗至其军部用绳勒死，文大可因参加了石友三的共谋会，恐也遭杀头之祸，连夜率教导师之一部约两千余人逃往朝城，公开当了汉奸。

石友三兄弟被杀后，蒋介石委任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原来所在军的军长，委任暂编第三师师长米文和为六十九军军长。集团军总部各机关移到刘下屯一带。各师的建制，除教导师撤销外，其他仍旧。随后蒋介石发来一部枪支、弹药和军饷。

我县古云集一带是一九三九年冬被其暂编第三师占领的，师长米文和。后来暂编第三师调走，由其暂编第一师接防，师长是孟兆晋。一九四〇年冬，被我军击溃南逃。一九四一年春，与日军构结，卷土重来，将其军事素质名列前茅的一八一师布防在这里，师长是张云溪，六千余人。一九四二年秋，全集团军惟恐陷入我军民的天罗地网铜墙铁壁中，逃至隴海

路南，一八一师为后卫。逃前，师长张云溪向其部下诈称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南去整训，并囑对当地群众保密。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的暂编第三师、暂编第一师和一八一师次第盘踞我县古云集一带仅是不足三年的时间，但欠得那里群众的血债却罄竹难书。现只把我组调查到的整理于后。

一、动用所有宣传工具，利用所有宣传能力的歹徒，恶毒攻击我党

这伙顽军声嘶力竭地吠叫：“共产党是赤匪。”“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惯卖迷糊药，上不孝父母，下不养儿女，专做共产党的奴隶。”“抗日联合救国会共产党的油饼子队，专向穿新衣服的青年妇女身上抹油。”

“共产党的军队游而不击。”“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是私生子。”且到



处散发诬蔑我党、我军、我抗日政府、我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和农村党员的漫画，更荒唐的是把我徐庄党支部书记徐洪袍画成锯齿獠牙、鬼爪兽脚的驼背怪物，通辑归案。这种葛培尔式的造谣惑众，是欺骗不了群众的。广大群众在我党领导下予以一一揭露，使其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笼络封顽分子，建立区、乡、村反动政权，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

这伙顽军来古云不几天，就加封劣绅王文海为古云区区长，区公所设在古云集。古云区的各乡、村相继建立了地主阶级操纵的封顽政权，这些乡、村之长多是地痞、流氓、惯匪之流。顽军和古云一带的封建势力结成一体。顽军利用区、乡、村政府横征暴敛，封顽势力则以顽军为靠山向群众敲诈勒索、狼狈为奸。

顽军在我县的古云集、葛楼、孙堤口等自

然村盘踞，师部设古云集。把古云集一带的男劳力全部征去修筑围寨和砍伐树木，凡成材的除劣绅和其狗腿子外的全部伐尽。树枝作鹿寨，树干作燃料。群众称古云一带各村庄为秃头村，情景异常凄然。征粮、征款、征物以及家畜、家禽等无所不征。总之顽军六千余人的衣、食、住、用，加之顽军头目和区、乡、村政权人员的挥霍，统统压在古云一带的群众身上。当群众无力交纳时，就派兵坐催，甚至捆绑、拷打和关押。很多无辜群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最后还得逃亡外乡。祸古云集一带为赤地

三、血腥镇压我农村党员，肆无忌惮地抢劫群众财物，野兽般地汗污妇女

这伙顽军以其区、乡、村的暴徒做间谍，监视我农村党员的革命行动，徐庄、岳庄、古云集是被其监视的重点。一九四〇年三月间一拂晓，顽军动用三个连的兵力驰奔徐庄，以两

个连的兵力布哨于庄外，以一个连的兵力在村内挨户清剿，将农民王金香、张慧义、徐称先捆绑拷打，逼供徐庄的共产党员。这三位有骨气的农民宁死不供。共产党员徐广谦被捉住后，惨遭几阵拷打，昏倒在地，经用冷水泼身苏醒过来，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又把他拴在马颈上在徐庄附近村庄游行示众，之后活埋在西池村。但顽军还不解恨，复又烧毁房屋数十间，抢牲畜四十余头，鸡鸭猪羊抢之一空，吵吵嚷嚷窜回窝中。同年四月间，顽军又先后把徐庄共产党员徐洪俊、徐开宪和古云集的共产党员陈泽琛、陈泽霞、陈泽云逮捕。这五位同志虽然受到各种严刑，始终没有泄露我党的秘密，且把刑场做为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这伙倒行逆施的刽子手们感到其阴谋无法实现，便下了毒手，将这五位同志活埋的古云集至铁庙之间的路旁。他们在就

义前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石友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夜间，这伙顽军还经常四出附近村庄，闯入民宅大肆抢劫，遇青、壮年妇女即强行轮奸、被奸污妇女的丈夫、父母、子女旁跪求饶也不能幸免。在一夜间仅一个村庄就有三个妇女遭到奸污。未婚的青年弱女简直成了父母的忧愁剂，无奈托朋告友为女求亲。有的因遭奸污而含羞自杀，在当时类此灭绝人伦的话传是屡闻不鲜的。

四、抓丁抓夫，盘诘路人，把人烟稠密的古云集一带蹂躏成绝域

这伙顽军经常派队四出抓丁抓夫；抓到青、壮年便强迫当兵，抓到老年便强迫修工事、建房屋、掏厕所，扫庭院等等一切劳役。被抓去的群众因惦念家中父母儿女无人照管，不为其效劳时，便惨遭毒打，直至折磨而死，当谁家的人被抓去后，全家痛苦流涕，无奈把

家中所有财产卖尽，托朋告友，把人赎回。致使我古云集一带的群众终日惶惶不安，白天不敢下地劳动，夜间不敢脱衣就寝，更不敢走亲串友、赶集上店，听到顽军来村的消息便扶老携幼惊慌外逃。顽军还经常在古云集一带的各个路口设岗布哨，对过路行人逐个盘问，除老弱残疾者外，均遭逮捕。致使繁荣的古云集一带路断人稀，成为绝域。

① 王醒华，本县古云公社文明寨人，曾留学日本，因罪恶滔天被我政府枪决。

② 汪健，浙江人，黄浦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是蒋介石直接派至高树勋军的军统特务，对外称少将参谋。

## 日伪时期伪区、乡机构和保甲制

郭 希 文

汉奸刘仙洲到莘县后，把莘县划为六个区，区下设乡，实行保甲制，统治压迫莘县人民。

各区、驻地、人员组成及其罪恶活动简述如下：

第一区：区公所驻武庄。区长武纪月，本区武庄人，地主成份，当地劣绅。

第二区：区公所驻姬家，区长孙翠然，本区小赵庄人。恶霸地主，人称孙二天爷。

第三区：区公所驻燕店，区长窦显廷，本区燕店人，地主成份。

第四区：区公所驻大索庄，区长周景诗，小邹家人，富农成份。

本区下辖八个乡三十九个自然村。

大索庄乡：乡长夏哲生，大索庄人，地主成份。

后吴家乡：乡长吴承启，后吴家人。

崔马固乡：乡长崔克忍，崔马固人。

南无村乡：乡长赵春芳，南无村人，该乡长效忠敌伪，窥探我军政情况向敌伪汇报，我政府屡次晓明大义，宣传我党政策，该人终无悔改之意，致使我军政机关遭到破坏，群众遭到屠杀、民愤极大，被我政府镇压。

周元町乡乡长范丙申、周元町人，身虽为伪乡长，但能接受我党教育，为群众避险就夷，解放后，保留任用。

占海乡乡长占嵩贵 占海人

于楼乡乡长于泮勤 于楼人

董王庄乡乡长（忘其姓名）

于一九四一年春，周景诗罢职，调伪五区

区长武明阳来大索庄任四区区长，并为六大乡  
即天齐庙乡 王化乡 付庄乡 崔马固  
乡 占海乡

第五区：区公所驻大宋庄，伪区长武明阳  
武庄人，地主兼劣绅。我军攻克莘县后被活捉，  
畏罪自缢。

第六区：区公所驻黄楼店，区长徐振龙（  
籍贯不明）。

区乡以下，设有庄、闾、邻之编制。庄、  
以自然村为单位，设正付庄长各一人；庄以下  
有闾，每闾二十五户，设闾长若干人；闾以  
下有邻，每五户为邻，设邻长一人。籍此为横  
征暴敛，敲诈勒索之手段，更毒辣者互相监  
视。如一户之人，有嫌情可疑，不予回报，四  
户连座，一人犯法，全家受累。横征暴敛，名  
目繁多，滥加摊派，敲骨吸髓，粮款税捐，年  
不计数，木石砖瓦，搜刮无余。官役衙丁、接



踵摧派，区乡暴徒，临门呵斥，官绅结体，狼狽为奸。如此种种，尚不为快，更有甚者，小股伪军，三五成群，深夜潜出，到城周邻村，打家劫舍，指通八路，绑票索款。昼则结队四出，杀人放火，所过村落，幸免者稀，造成市井萧条民生凋敝，农村荒芜，十室九空，全境人民虽秕糠难以饱其腹，鹑衣百结无以蔽其体。不得不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四出逃亡。更可叹者、老嫠穷嫠、坐守毙命、臭尸白骨，难觅掩埋之夫，流浪弱子，嚎饥道旁，不有引归之人，诸如惨景，亘古未有，此乃日伪合流，官绅结体，实行保甲、横征暴敛、草菅民命，吮人血肉之罪魁祸首刘逆仙洲之所致、哀哉！我人岂能忘之。

## 汉奸县长刘仙洲、李海泉

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二，日本侵略军在汉奸刘仙洲为向导的配合下侵占了莘县县城，从此至一九四四年，莘县人民被奴役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刘逆仙洲原籍泰安，一九三七年在泰安一带的杂牌军中冒充“抗日”的草头王。一九三八年投降日军，配合日军在青岛一带扫荡，同年十二月随日军到达鲁西北，这个卖国求荣深得日本侵略军宠信的忠实走狗，进占莘县后，便即位伪县长兼保安司令，他在莘县占据六年之久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初到莘县他首先与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刘玉轲结合组织了维持会，强化治安，进而扩充伪军队，安置亲信，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由初期的四个伪中队、千余伪军到一九四

四年时已扩充到十六个中队，三千余人，更由他积极反共效敌有功，被封为“名模县”，成了日军侵占鲁西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日军的一个中队，留有山炮一门。

刘逆仙洲为巩固伪县长兼保安司令的宝座及进一步取得主子的信任，曾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莘县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

构筑城防工事，选建据点，建立坚固的反动营垒剿穴。

刘仙洲占据莘县后，首先动手加固城防工事，在四乡抽丁抓夫，驱使劳役，拆毁民房，修筑堡垒，挖深护城壕；砍伐树木，架设鹿寨，自以为有穴可据，不仅如此，向城外修筑公路，选建炮楼安“钉子”，如西吴家、燕店、王化、马厂、张屯、玉皇庙等十余处，做为外围据点。冯此可以收“分方控制，进守有据”之利，以形成对我军民蚕食、扫荡、合围、清

剿、封锁之局面。刘仙洲盘踞六年之久，外出扫荡不下百余次之多，他们敲诈勒索扰害百姓、破坏抗日政府，袭击抗日武装，烧、杀、抢无所不干。仅以一九三九年夏的一次大扫荡为例，大名、冠县、朝城、莘县的日伪联合行动，纠集数千人，合围杨庄、武家河一带军民，北庄、北安头、大索庄三村计之，横遭戮杀群众不下三十余人，时北庄村长孔繁需被机枪射杀，觅尸三日，始得掩埋于土。年迈六十岁老人秦安臣身受十余刀，伏于血泊之中，将近一日之久，始吟音复苏，才得幸免，至今伤疤满身，出气喘促。张鲁回民抗日志士杨绍震和夏庄阎门楼连同大索庄农民黄双印等均被刘仙洲部押至莘县城，严审拷打，体无完肤，后倒栽活埋于县城东关外。北安头共产党员马林瑞、民兵张鼎臣被绑在枣树上用木榔头活活夯死，……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残酷镇压手段力图征服

民众。

在武力镇压的同时又发展各种特务组织，对人民进行奴化宣传，妄图从精神上征服人民，伪政府设有反共宣传班、特别工作队、还有新民会等特务组织，反共宣传班为首者姓龚，人称龚班长，东北人，为日本侵略军效劳十分卖力，宣传什么“日本大帝国是要帮助中国，不是侵略中国”，“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是为挽救衰弱落后地中国而来”，“为建设东亚共荣圈，以求共存共荣，”等等，以其反动的卖国理论效劳日本侵略者。

卖国投身的刘仙洲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人民的法网。在我抗日军民的坚决打击下，莘县城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刘仙洲被八路军生擒。

继刘仙洲之后，伪山东省政府随即又委派了一个汉奸县长李海泉卷土重来。

李海泉也是泰安人，是刘仙洲的亲信，曾由刘仙洲提拔为原莘县建设科科长。李是个大高个，黑脸，野人一般，解放莘县时他侥幸外出，免得一死。新任命的伪县长李海泉纠合了山东省保安队一个营，聊城保安队一个团，还有莘县的一些残余散兵杂乱人员共一千余人，杀气腾腾直奔莘县空城。

李海泉占据莘县后得意忘形，疯狂至极，他扬言营救刘仙洲，经常出城扫荡，所到之处仓场一空。同时，强征民夫赶修加固城池，出工时遭受到监工毒打的民夫不计其数；李海泉还滥捕乱杀无辜，曾在伪政府当传达的路兰田和他的儿子一起被枪杀，除逮捕一批无辜百姓外，还在东赵庄杀了五人，陈蒋庄杀了五人，更残忍的是在城西机关枪眼里点活人打靶，曾将郝道昌、王其贤及河店的郭某绑在梯子上打活人靶，先打脚和腿，后打中部，最后打脑袋

气氛是十分阴森的，其恶毒残忍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罪大恶极的伪县长李海泉重占莘县一百天，就在我抗日军民共同打击下便弃城逃跑了，全国解放后，将李逮捕归案并押回莘县伏法，在执刑前问他“屈不屈，冤不冤”，他答到“不屈不冤该死”。这就是两手沾满莘县人民血迹的汉奸李海泉对人民欠下的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应得报应。

资料：邹荣川 郭希文 赵仙如

整理：杨忠平

## 莘县回族简介

### 概 述

明代“回回”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随着明初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回族的分布有了很大变化。华北各地及运河两岸发展了不少“

“回回”聚居点。莘县回人多见于明代。

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境内清真寺的出现就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莘县的传播。张鲁清真南寺、刘营清真寺都出现于明初。全县八坊清真寺“十年浩劫”中大部被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修复了五座清真寺，均恢复了宗教活动。莘县无新旧教派之争。

莘县回族群众在服饰、饮食、婚姻、丧葬、节日等风俗习惯方面也表现着十分明显的传统性。

回族青少年首先接受经堂教育，建国后普遍接受汉语文教育，农村儿童入学率已达百分之九十六。张鲁回族镇还建立了“本斋回民中学”。回族喜欢演练查拳，每村都有民间查拳教练，张鲁集素有“武术之乡”的称号。

莘县回族人民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汉



族人民一起辛勤劳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旧社会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尽了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人口发展缓慢，光绪年间全县仅有九百一十七户，一千三百六十九人。莘县回族人民和汉族兄弟一起为了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宋景诗的黑旗军中就有著名拳师蔡常青任先锋队领队。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还是在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县回族人民都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出现杨见远、李中允等英雄人物，可统计者三十余名回族英烈为国捐躯。

解放后回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生活发生根本变化。尤其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回民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前进的步伐更快，真正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民族政策也得到了真正落实。一九八三年全

县已有回民一千八百零五户，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在朝城、张鲁等十九个回民聚居点。人均年收入三百五十元。高档家俱、家用电器已进入回民之家。

莘县回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一起，正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党的各项政策的指引下，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 回 族 渊 源

从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到一二五八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在每次胜利的征战中，将大批中亚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强迫东迁。元统一中国之后，他们在各地留居屯田，之后入社编民。元代是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明代回回开始形成一个民族。

莘县回族可考证者出于明代。朝城《蔡氏族谱序》载“我世祖初由山西洪洞县迁居朝城张鲁集，遂家焉。历传数世，人口衍繁，嗣

由张鲁分居朝城城内、宋海、桃园等处，以耕读为业。”

又《马氏宗谱》记：“予始祖居山西洪洞县，讳坤字，太保明初御前待卫，勅封护驾军……。五世祖于前明成化间由郟邑王家营迁居朝城北关。”此马姓称“郟城马”。

另据，朝城《左氏续修谱序》载“吾左氏于清康熙二十二年由齐河县三里庄迁居朝城城内北街，卜宅而居。”

张鲁镇《杨姓家谱》记、祖籍济南大槐树街，于清代初迁居张鲁，当时为兄弟二人。其兄定居张鲁中街，其弟定居沈庄。其名杨文孝。历传至今已十一辈次。五世祖时，有一杨增，曾任锦州知府。朝城王姓是由聊城张炉集迁入。沙姓由冠县十里铺迁来。张鲁西街王姓自本县毛坊村迁入。东滩宛姓大户来自北京通州。（均据王、沙、宛姓家谱所记或口碑所

传)。

俎店乡刘营村地处古南北通道之咽喉。有五营(刘营、滑营、呈营、延营、梁坯营)、四哨(邵庄)、前山(山堂)、后店(俎店)之说。刘营大姓王氏,祖坟数处二十余辈次,推算在此定居不下六百年之久。刘营回族历有习武之风,村子不大,却声震乡里。

据上述记载参订,可断知莘县回人在元、明之时驻兵屯垦,定居本地;有自山西洪洞祖国各地迁居而来,可谓渊源流长。

### 人 口 分 布

元代东来之回回,多数系签发东来之“回回军”,及部分学术人士、匠人商人等。迁来以后分散各地,大分散小集中。在乡自成村落,在城自成区域。又由于回回每至一处即建清真寺,围寺而居也成为居住分布特点。

原《朝城乡土志》(1905年修)记有“

本境之回人多聚居城内北街关厢与城西北四十五里之张鲁集。他村也有之，皆零星小户。”

莘县回族居住村点都与汉族兄弟共同定居，和睦相处，世代友好。回汉杂居中，回族又相对集中。如朝城镇回族居北街及北关、西街之一部分。张鲁镇五个街，回族占四个街。回汉两族在各自住区按各自风俗习惯，自由生活，互相尊重对方风俗。

我县回族有十几大姓氏：马姓、李姓、蔡姓、杨姓、何姓、宛姓、左姓、王姓、沙姓、张姓、栗姓、武姓等。“十个回回九个马”，马姓在我县分布最广。又有以姓氏家族自成村落，如妹仲乡栗海村，全村皆姓栗（仅一户外姓）。张鲁东街有一厢称“马家院”，集中居住着马姓回族；东街端头原称“十户杨庄”集中着杨姓家族。东滩集聚着宛氏家族。

在分布上有大村大户向外分散。朝城《左

氏续修家谱序》记有“相传数世，人口繁衍，户籍日增，以故又分居陈庄、陈堂、谢集、八里铺等村。”朝城附近宋海、桃园、马场、谢炉、谢集、八里铺之回民均由朝城马氏、蔡氏、左氏家族分迁而居。

也有个别村庄原曾居住过回族，后陆续流动至回人聚集之所。如城关镇毛坊原有回族王姓居住，后迁住张鲁西街，至今毛坊还住一回民王姓老人。

莘城镇历史上并无回人定居。建国后，回族干部和职工陆续增多，城内回民定居也随之发展。目前，回族干部和职工分布各个系统，一九八五年莘城镇回民已达三百多人。

## 第二节 人 口

莘县回族人口历史上每个时期并无确切记载。旧志对回族人口资料更是寥无所见。只列

两表如下。

表1、光绪三十一年《朝城乡土志》所记：

朝城回族户籍人丁分布表

村名	户数	人数	村名	户数	人数	备注
朝城北街	112户	230人	马场	5户	9人	
朝城西街	57户	80人	谢集	10户	20人	
朝城北门外	14户	20人	桃园	8户	20人	
朝城西门外	2户	2人	八里岔	5户	20人	
宋海	2户	9人	聚海	25户	30人	
陈庄	2户	5人	避炉	5户	10人	
陈堂	2户	10人	石庄	3户	4人	
张鲁	665户	998人				
			总计	917户	1366人	

民国二十二年所编《莘县志》卷一载“回教，考乡土志载清初时城北十里岔有礼拜寺一座，城西南二十里路满村有礼拜寺一座，此两

处回教约三十余户，共计一百五十一名。”

表2。

1982年人口普查回族人口分布情况表

乡 镇	村名	户 数	人 数	乡 镇	村名	户 数	人 数
朝城镇	朝城	331户	1477人	张鲁镇	张鲁	796户	3291人
朝城镇	陈庄	18户	66人	张鲁镇	葛庄	60户	247人
朝城镇	谢炉	13户	65人	张鲁镇	沈庄	18户	102人
朝城镇	宋海	16户	70人	妹仲乡	栗海	70户	310人
柳子园乡	陈堂	15户	65人	组店乡	刘营	86户	413人
徐庄乡	谢集	40户	173人	组店乡	西路满	20户	80人
徐庄乡	八里铺	20户	96人	组店乡	宋庄	25户	110人
徐庄乡	石庄	7户	35人	岩集乡	东滩	115户	560人
徐庄乡	马场	20户	99人	单庙乡	十里岔	23户	121人
徐庄乡	桃园	26户	125人	城关镇	县城	36户	348人
总 计			1,305户,				7,853人



编者注： 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回族人丁表所提供的数字统计未必确切。

2、 对于回族人口的发展建国后人民政府一直予以极大关注，即在我国人口出生高峰的八十年代，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人口政策也作出了特殊照顾规定。《中共山东省委关于二胎生育政策的暂行规定》（1984年5月10日鲁发〔1984〕17号）第一条第八项：夫妇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可以生二胎。

## 莘县境内八坊清真寺小考

杨 忠 平

莘县地处鲁西边陲，相邻冀予。本境内所见清真寺八座，全县7,850余众回族穆斯林弟兄除北部边沿十里岔村属聊城齐袖清真寺“高目”（属民）外，其余十八个自然村的穆民

分属该八坊清真寺“高目”。考察该八坊清真寺的史略，对研究伊斯兰教在我县的传播、回族同胞的迁徙发展以及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八坊清真寺分别是：张鲁南寺，张鲁北寺、张鲁女寺、刘营清真寺、西路满清真寺、柴海清真寺、朝城清真寺及东滩清真寺。

张鲁南寺较其他七座清真寺规模为最大历史为最久。该寺居镇中心南北街座东向西，分西门及南便门，西门为塔楼式纯砖石结构，故称“无梁殿”。南门为月亮门，素日均走南便门。该寺占地面积三市亩有余，寺内建筑包括礼拜殿、南北讲堂、东对厅及沐浴室，礼拜殿前是南北对称的石碑楼，整个寺院组成一建筑群落。

礼拜大殿在一米高殿基上建成，阔五间，包括鼓棚及前后两殿，大殿内明柱四十

根，三梁九檩起架，方砖漫顶，木板铺地。同时能容千人以上做拜功。张鲁南寺始建年代不详，经考该寺早在明初即存，曾有碑文记载“永乐三年修复（公元1405年）”“嘉靖年间修复”“大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重修清真寺并添增大学膏火碑记”；朝城张廬集旧有清真寺屡经修葺？（张鲁镇原属朝城县）。该寺已在“文革”中破坏，荡然无存。

张鲁北寺建于北街，初建年代约在清代乾隆年间，除规模小于南寺外（面积一亩半，礼拜殿三间，无西门），布局安排与南寺相同。据传早年全镇穆民共用南寺，后又建北寺，使用北寺的除北街穆民外（北街李姓为大姓氏）还有西街李姓穆民同属北寺“高目”。该寺在大跃进时代陆续拆掉。

张鲁女寺建于镇中心与南寺东西相望，仅为女性沐浴礼拜用，女寺原有礼拜殿五间，北

讲堂三间均瓦房，无殿基，该寺毁于“文革”中。

朝城清真寺座落在朝城北街，南北大街路西，面积两市亩有余。“文革”中虽遭部分破坏但幸免一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迁出了占用单位，内外穆民筹集资金于1985年进行了修复，整个寺院为一进三的院落，由塔楼式的门庭、串厅、礼拜殿及后院组成，该寺礼拜殿为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有鼓棚及前后两殿，砖木石结构，殿基在一米半以上，整个结构错落有序高大威严。在大殿北墙清晰可见有修补过的痕迹，那是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占据朝城时用炮弹轰击后坍塌的墙洞，如今成了外夷入侵中国破坏宗教信仰的罪犯。

该寺始建年代不清。建国初期时在串厅的北墙还能看到“清康熙年间修复”的铭石碑，

既是“修复”那始建年代还会更早。据在朝城发现的《马氏宗谱》所记：……第五世祖於前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迁居朝城北关，“《蔡氏族谱序》：”我世祖初由山西洪洞县迁居朝城县张鲁集……嗣由张鲁分居朝城……。”这就是说在明初中时期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在此定居，这个时间与明初由山西向东迁民的事实相复合的。

刘营清真寺建在村西头，在选址卜基上与其他寺不同，但仔细分析发现刘营寺为刘营、宋庄、武庄三个回族村的穆民共同使用，两村分别居刘营的西北、西南方向，三村呈三角形，该寺虽在刘营，但地址是选在距其他两村最近处，仍体现回族同胞“围寺而居”之特点。该寺因部分坍塌于1973年重修，目前有大殿、门厅及六间北屋。寺内存一完整石碑，

民国廿一年（1933）所立，碑文记载“莘县城西南刘营村旧有清真寺一所，创于明季，重修于清”

栗海村地处张鲁与朝城中间，村中建有一清真古寺，该寺于1983年重修，目前有大殿三间，讲堂、浴室、住室共四间，礼拜殿为三间带抱厦的瓦房，殿基高约一米，在这小村落中是唯一高大的建筑物。该寺大殿内有一倒放的石碑，题头“流芳百世”，碑文要人们虔诚信主，为人行善，该碑为清代嘉庆癸酉年（1813年）间立，距今173年，但该寺出现在此碑之前。

西路满村原有一清真寺，寺院面积不足一亩，寺内礼拜殿三间，另有南北配房各三间，该寺毁于大跃进时期，目前穆民为刘营清真寺“高目”。1985年夏，曾在村内找见一残碑，题“万古流芳”。碑高一米，宽半米，碑文

已大部剥落，断续可辨为清代光绪年间所立，大意为寺内有地产260亩，寺内财产不得任意动用，只可救急穆民。西路满寺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地产260亩，可见该寺之存在时间久远。

东滩寺占地1·5亩，目前有大殿三间，配房及门庭共七间，所有建筑修复完好。始建年代无可辨析。

历数张鲁清真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曾有许多大阿訇在这里开经讲学，著名阿訇杨云鹏、沙梦毕、沙风额、何其宽先后主持教务，他们在经典教义的研究方面都取得很深的造诣，也培养了许多“阿里凡”。抗战时期，张鲁镇成立的回民抗日救国会就设在张鲁南寺，何其宽阿訇任会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爱国爱教，广泛的宣传和影响广大穆斯林决不当亡国奴，他们在清真寺的礼拜殿地板下为回民

支队掩藏武器，保护抗战干部，1942年秋季曾在一次日寇扫荡中清真寺被包围，鬼子汉奸逼迫阿訇们交出回民支队埋藏的武器和粮食，他们怒目而视，最后，残忍的敌人大打出手冲向沙聚广阿訇，并将其按倒在地往嘴里灌辣椒水，进行残苦折磨，众阿訇无一屈服，表现了民族大节。尤其是回民支队进驻张鲁之后，邀请蔡永清阿訇参加回民支队，清真寺便成了回民支队联系群众的桥梁；朝城穆民居住县城，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不管日本人和汉奸多么淫威或拉拢，他们没有一个投敌当汉奸的，表现了广大穆民爱国爱教的诚意。

在抗战当中，党的高级领导人宋任穷、黄静、杨勇、肖华、赵建民、卞彤等同志都曾先后在张鲁指导工作或战斗驻留过。1943年他们以张鲁南寺为中心召开各寺阿訇乡老、开明士绅座谈会，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



作，时至今天，张鲁镇的父老乡亲还不断念及这些抗日将士，传颂他们抗倭寇爱群众的恩德。

综述可以认定，伊斯兰教在莘县传播时间为明代，各地清真寺的相继出现是在明清时期。本地穆民能在此地长期定居和发展也是与汉族弟兄和睦相处的最好说明。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同胞如今活跃地分散在建设四化的各个岗位上，他们爱教更爱国，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1986年5月

## 张鲁查拳与拳师

杨忠平

查拳发源于鲁西一带，中心在冠县和莘县的张鲁回族镇。张鲁的回族同胞十分热爱这项武术活动，拳师辈出、代代相传。

张鲁回族镇开展查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以上，拳师中最有名望的算是祖籍张鲁东街牛角巷的杨鸿修先生。据有关资料介绍，驰名中外的武林泰斗王子平先生“从学于鲁人杨鸿修”。杨鸿修先生的长孙杨跃华说：“我祖父常讲，老家是张鲁东街牛角巷人，还在我曾祖父那一辈时，因为一桩官司担保失败而破家，曾用一担挑出走冠县，寄居冠县南街，在冠县莹地仅有三代老坟。”杨鸿修老先生，生于1864年，死于1944年。据杨跃华讲：“他老人家七十五岁时，一掌还能劈开七块砖，从冠县到张鲁镇五十华里的路程，步行往来，不费大力气。”一九四二年，因灾荒饥饿，他又从冠县迁居张鲁，两年后，即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去逝，去逝后，家人又把他埋葬在冠县莹地。

蔡四老师是张鲁北街较早的拳师，他的本名蔡常青（后代蔡春来早年迁居东北），曾在

张鲁、朝城设过教场。据拳师杨荫桐和蔡永青阿訇讲，蔡四老师曾是宋景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先锋队的领队，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宋景诗（1841年）的起义队伍中，曾有一支由张鲁回族人组成的“西域回回大队”。从蔡四老师的武艺来看，蔡四老师当是“西域回回大队”的主要人物。

蔡四老师在张鲁培养了大批的武术高徒，如著名的李春云、马宪龙、杨学德、何新德等，为查拳在张鲁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春云，人称李二老师，他先后在张鲁、聊城开过教场，培养了一批弟子，象武贵祥、杨荫桐、潘义臣等都是他的徒弟，而他最得意的徒弟是杨兆吉（杨兆吉曾到南方设教场，声振大江南北）。李二老师教拳的特点是既教拳

术又以拳歌相配，更可贵的是他收的徒弟不仅限于回族青少年，还收汉族青少年一道习武练查拳，为密切回汉两族的交往和团结做出了贡献。

马宪龙是张鲁北街人，他练的是硬功，学成后曾走南闯北，当过保镖，在芜湖勇斗过邪恶，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传奇般的故事。

杨学德，人称杨五老师，是位武功卓著的拳师，他是杨鸿修的本家，比杨鸿修长一辈。曾在张鲁东街设教场，培养出一批徒弟，较出名的有马从俭等。杨五老师也曾在聊城设过教场，至今聊城练查拳的回族人还自称是张鲁东街杨五老师传的拳。杨五老师后半生又受聘到济南教拳，据杨五老师的长孙杨增学讲：“他的轻功很好，济南来人请他是骑马来的，我爷爷徒步奔济南，结果我爷爷却先于骑马人到达

济南”。杨五老师最后死在济南。

何新德人称何三老师，张鲁南街人。他曾在张鲁南街设教场，他收徒弟仅限于回族子弟，也颇有影响。

马从俭是杨五老师的徒弟，曾在张鲁东街设过教场，培养出了一批徒弟，如杨贵枝、杨存生等，后来马从俭又把冠县的张西泰请来帮他教拳。在东街还有几位有名望的拳师帮他教拳，一位是底玉山，人称“底官”，他曾在旧军队中为过官，也有一身好武艺，不过他练的不是查拳；另一位是蔡金停，也是东街人，曾在江南谋生献艺，中年后回故里，曾为富人家护过院，解放后去逝。

解放后在东街设过教场的还有位人称“铁胳膊李新城”的老先生，他练拳时非常能吃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含糊。他家有棵树，每天都要在树上练臂力，用胳膊往树上

撞，故得名“铁胳膊李新城”。

五十年代末张鲁未成过拳场，六十年代末开始由杨恩成、武贵祥、杨贵枝、潘义臣等陆续收徒教拳，为张鲁培养了一批青年查拳手。如杨恩成、武贵祥的徒弟潘同钦、潘同亮和杨贵枝的徒弟杨文亮，马俊飞等。李春云先生家的传人李树广也没间断习武练拳。张鲁查拳世世相传，拳师代代有人。

著名拳师杨恩成先生十二岁时就拜冠县张西炎为师，并成为张西炎的得意门徒。十九岁时随张西炎先生去济南府打撞，仅用一个招数，就取得了三战三胜。这一招数就是著名的四路查拳中的“迎门三不顾”。

张鲁镇与冠县相距五十华里，都是回民较集中的地方，两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交往甚密，尤其是回族间的姻缘婚配更是把两地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这种环境也成了查拳在

张鲁发展的重要因素。著名的查拳大师常振芳先生与张鲁的关系就是一例。虽是冠县人但他在张鲁结婚成家，并先后在张鲁居住二十几年，可以说张鲁是常先生的第二故乡。常振芳先生对查拳很有研究，解放前是国术教官，解放后也曾培养了大批武术人材，他的弟子遍布中原，分散全国，称当代查拳权威。常振芳先生在张鲁期间也带了几位徒弟，誉满鲁西北的教练员武贵祥先生，还有民间拳师潘义臣都曾受过常先生的指教。

## 访抗战时期回民支队教长蔡永清

杨忠平 马 军

张鲁回族镇，地处鲁西北平原的西侧，当年，英勇的回民支队曾在这一带打击日寇，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的英名永垂千古。曾任回民支队第二任教长的蔡永清阿訇，现在这里欢度

幸福的晚年。

金秋时节，我们怀着敬仰之情，专程拜访了这位革命老教长。

这是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座落在张鲁街南侧。八十三岁高龄的蔡老，以他那回族老人特有的装束和礼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踏进他家门槛时，他正埋头阅读《回族简史》，并且做了学习笔记，我们看到那一行行流畅秀美的阿拉伯文字，还有那高高摞起的经书，不禁使我们肃然起敬。

这时，好客的主人端上两杯清茶，一股清香顿时在屋内散开，给人一种十分爽畅的感觉。趁机会，我们环视了一下房间内那朴素而又雅致的布置。注意力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正墙上悬挂着的那块崭新的镜框上，只见里面堂堂正正地镶着一个苍劲的大“寿”字，下面写着这样一段赠言：



书赠蔡永清先生：

一九八四年五月访老革命根据地莘县张鲁集。别来四十年，老友重逢欣喜非常。我与蔡老四十二年前在一起工作。那时蔡老是地方政府介绍给回民支队的随军阿訇，可谓宗教界上层人士，但蔡老与战士一样的生活，过绵山曾夜行一百二十里。今日相见，蔡老已八十三高龄，容貌体魄仍如当年。今为长者题寿以为祝。

张同钰题书

蔡老告诉我们：张同钰同志是当年回民支队的政委，现在北京，任职于地质部。1984年5月，这两位革命老人在故地重逢，欣喜异常，张同钰同志挥笔写下了这苍劲的“寿”字，并赠言以为祝贺。字里行间流露着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情感；表达了蔡老的革命精神和他的贡献。

蔡老出身贫寒，自幼丧父，是母亲含辛茹

苦一手把他拉扯大。青少年时期，就进入寺院接受经堂教育。他曾就读于冠县、大名县、南京、北京几处清真寺。三十年代，在北京东直门外清真寺挂幃，首任临清小炉村阿訇。蔡老多才博学，对阿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的教规礼仪均有较深的研究。“七·七”事变时，他正在阳谷县张秋镇东寺做阿訇。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啊！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这位宗教人士的心。在张秋镇，他目睹了侵略者烧杀奸淫的野蛮行径，特别是焚毁清真寺那一惨景，常萦绕在他的心头。1940年，日本侵略者再次侵占张秋镇，面对残暴的敌人，蔡老一气之下离开了张秋镇，返回故里。当时，张鲁集是我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回民中心区。一到家乡，他很快就投入了抗日的革命洪流。

说起回民支队，蔡老特别有感情。他介绍

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回民支队，是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冀中地区发展成长起来的。是冀中军区野战化最早的一支部队。当时，回民支队的司令员马本斋和政委郭陆顺等，领导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广大战场，在那一带打了许多胜仗。回民支队和马本斋的名字，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之后，回民支队由马本斋司令员率领，来到了张鲁集一带，张鲁集的回族乡亲喜出望外。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敌人的疯狂破坏加上大旱灾，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尽管这样，张鲁集的群众还是把司令部安排到最好的地方，想方设法让回民支队的战士和马司令住的、吃的尽量好一点。记得在马司令员刚到张鲁集后，我们清真寺内还专门设便宴款待他。那一天可真热闹啊！眼看这位转战南北的抗日英雄，大

伙都为回族同胞中出现一位这样的人才而自豪。便宴中，马司令员提出了请教长的事，并告诉大家说：回民支队在冀中时就有一位教长，后来，在一次战斗突围时不幸牺牲了。我们当时就答应了马司令员的请求。于是，张鲁南北两寺商量后，大伙一致推举我去。就这样，我愉快地接受了马司令员的邀请，离家随军，成为回民支队的第二任教长。

蔡老接着回忆说：记得当时是1943年的早春，回民支队的司令部设在北小丈村。那天一大早，马司令就派回民支队的几位战士牵着马来接我入伍。对我们回族人民来说，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消息像长了翅膀的小鸟，一下子就飞遍了张鲁五街，乡亲们奔走相告，喜气洋洋，纷纷赶来送行。张鲁两寺还特意派代表，一直把我送到北小丈村，那动人场面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到北小丈后，马司令员又专门设

便宴欢迎我。那情景就更感人了，战士们为我的到来而高兴，烧菜做饭忙了大半天。我和马司令员是同龄人，如果他还在世，也八十多岁了。当时，我已四十二岁，家中上有老母亲，下有四个儿女，生活极其艰难。对于我离家从军，全家人又喜又怕。他们知道前任教长已牺牲在枪林弹雨中，怕我有个三长两短。但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把爱国、爱教、爱家溶为一体，做了我的坚强后盾。

由于我们急于了解蔡老在回民支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便迫不及待地问到：“蔡老，您在回民支队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为了照顾回族战士的风俗习惯？”

问到这里，他笑了，笑的是那样爽朗。蔡老说：我的身份是教长，另外，还有四位师傅做一般的宰牲事务，回民支队聘请教长，体现的是回族的特点，符合回族战士的要求，是党

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化，是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正如吴玉章同志在延安马本斋司令员追悼会上所说的那样：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群众结合起来，又以伊斯兰教的教义发挥了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因此，他能打许多胜仗，使回民支队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一支坚强力量。

参加回民支队后，蔡老被分编在司令部。当时，回民支队下属两个大队和司政机关。回族战士大约占十分之四左右。蔡老随司令部活动，和当时的管理员刘克凡先生住在一起。平时蔡老照例履行宗教职责。例如在滑营战斗中，有位河北籍战士光荣牺牲，蔡老都是按伊斯兰的教规亲手给他洗的“埋体”，穿的布。在延安挖窖洞时，有位回族战士被塌方压在洞内，不幸牺牲，也是蔡老亲自安葬的。在回民支队里，回、汉族战士都十分尊重他，都称他

为“教长”。蔡老还告诉我们：马司令员总是很关心他，经常过问他的生活和其他情况。在那战争岁月里，由于是游击环境，流动性很大，三天两头换地方，一有敌情更不安生。有时端起饭碗发现敌情，饭碗一丢立即行动。当时，他们在这一带常住的地方是马颊河两岸的村庄。后来，转移到黄河两岸的濮、范、观一带活动，生活就更艰苦了，后方供应无保证，在朝城一带活动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吃到黑豆，有时司务人员费很大劲，才能给马司令员弄到一碗面条，司令员总是设法让给有病的同志。冬季只能有部分战士领到棉被，其他战士领一件棉袍，每当这个时候，回汉战士总是互相推让。整个冬季，战士们都是在相互关怀和体贴中战胜严寒的。那时的战斗十分频繁一要打鬼子，二要对付汉奸。但是，不管部队多紧张，战斗多么危险，回民支队的战士都是时

刻设法保护着蔡老的安全。

蔡老还回忆了回民支队调往延安的一些情况：1944年农历正月初，我们驻在濮城县的一个村里。一天，张同钰政委和董庆云副支队长找我谈话，说部队要转移，希望我能随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是保密的。一直到我们进入太岳根据地时，大家才明白了这次调防是去延安，是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记得当时我们是正月初九出发的，出发前的正月初四去后方医院看望了病中马本斋司令员。那时，他一再嘱咐我们，叫我们先走，说他病好后就去追我们，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与马司令员的永别。

在奔赴延安的途中，上至杨得志司令员，下到战士，都特别关照我。战士都是步行，身负四、五十斤的辎重，而我和副支队长董庆云合配了马匹。正月十五日夜，部队通过平汉铁



路封锁线，地点在安阳与磁县之间。首先，二大队在向导带领下顺利通过，而一大队和司令部跟前面的二大队却失去了联系，不知什么时候，闯到敌人碉堡下面，双方立即交上了火，当时就有个战士牺牲了，二中队长刘秀伍也负了伤，头一次没过去。紧接着，组织部队强过铁路线，这次还好，找到位向导，避开敌人，一个急行军穿过了平汉铁路，迅速进入了太行山根据地。部队继续西行，大约又走了一个月的时间，古历二月十五过同蒲路封锁区，这次更困难，一百二十多里的路程，地形十分复杂，有铁路、公路、河流、还有无人区。部队领导下达了命令，每人准备四天熟食，四天生食，共计八天的给养。一再要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用一夜的时间，先穿过封锁区。大伙都早早做好了准备，回汉战士相互照顾，太阳落山前，我们按规定走完了二十里的

山路，出了东山，进入平原开阔地带。这里是敌人周密部署的封锁区。幸亏有夜色的掩护，下路后大家一溜小跑，无声无息地穿过了平遥公路。紧接着又过了同浦铁路，涉汾河，一夜强行军一百二十多里，胜利进入了一个叫西山的地方。这时，汗水湿透了我们的棉袍，山风吹来，身上不住的颤抖，但战士们没一个叫苦的，心中反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从敌人鼻子底下通过却没被发觉，大部队全部通过封锁区以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是掩护我们的部队和敌人交上了火。越过同浦路封锁区，直奔延安的东北方向，又历时两个月的急行军，终于翻越吕梁山脉，到达黄河边，在陕西的佳县地段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根据地。记得在米脂县的一个礼堂里，杨得志司令员召开排长以上干部会议，沉痛地宣布了马本斋司令员逝世的消息，在场的人都掉下了眼

泪，纷纷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继续前进，于1944年古历三月末，到达延安以南九十华里的甘泉县王庄沟驻地。历时八十天的大转移，我们终于来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在延安的岁月里，蔡老又是怎样生活的呢？他接着告诉我们：当时，党中央对回民支队是十分关心的。马本斋司令员逝世以后，上级任命马凤舞为支队长，张同钰政委调党校学习，刘世昌任代政委。后来，回民支队改编为教导旅，归杨得志司令员领导。部队在甘泉住下后，脱离了频繁的战斗生活，有的人去学习，有的人去开荒生产，还有的搞经济工作，无论干什么，回民支队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党把他们安排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战斗，兢兢业业，处处起模范作用。据蔡老回忆，当时，上级按团级待遇，专门为他配备了马匹、

警卫人员和相应的伙食标准，并积极支持他履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他去延安很方便，有时还在延安清真寺住几天。延安清真寺的教长叫马生福，是关中人，当时已六十三岁。对蔡老的到来，他十分欢迎，二人常在一起研究教义教规。

蔡老还回忆到：在延安我接触比较多的是张杰，我常随他去边区政府办理公务。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说林老（林伯渠）要接见我。于是，我没顾得修整衣帽，就匆匆赶到了林老住处，这时，林老已等候在门口。一见面，林老紧紧握住我的手，关切地询问我到延安后的生活情况，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们谈了足有半个多时辰。最使我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对我的一次谈话。记得是在延安召开联合政府筹备大会那天，我和马生福阿訇等六人应邀列席会议，被安排在会场前面就座，与毛

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相隔一排连椅。那次会上，是周副主席讲的话，一气讲了三个多钟头。散会后，其他首长都陆续走出会场，周副主席特意来到我跟前，与我握手问好，并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周副主席还问我，他的讲话能否听得清楚。周副主席一再要我安心在延安生活，不要惦记家，家庭，地方政府会照顾的。周副主席还鼓励我说：“象你这样的宗教界人士参加到队伍里来，全国也不过十几位，你走的路很对，是进步的。”周副主席的话深深记在了我的心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想起这番话，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抗战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记得秋天时，大批的干部要调离延安，当时，我也随部队告别了延安，走清涧东渡黄河，住了一个叫石家寨的地方，听候分配。由于我离家已两年时间，从没通过音信，首长征求我的意

见时，我提出了探家的请求，领导当即批准了我的请求，并发给了我路费和一头毛驴。又经过了八十天的长途跋涉，终于返回故里。后来，因为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我几经周折也没找到部队，与自己战斗生活了多年的火热集体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后的1954年，当有关领导得知我仍在乡间从事宗教活动时，十分高兴，极为关怀，给我寄来了生活补助费，我被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付主任。现在，我还是莘县政协常委呢！

夕阳把一片金辉抛洒在这座农家小院里，不知不觉我们和蔡老已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在我们恋恋不舍地辞别蔡老之后，当年回民支队的战斗生活，回汉战士共同谱写下的团结乐曲，仍在我们的眼前浮动，在耳边盘绕……。

## 鲁西北烈士陵园

鲁西北烈士陵园由鲁西北行政公署一九四五年建立，座落在莘县大王寨乡东丈八村西，故又称丈八烈士陵园。陵园紧邻莘冠公路，距莘城二十三公里，座北朝南，东西宽一百五十米，南北长二百四十米，占地面积百余亩，是我省鲁西北地区最大的烈士陵园。

陵园门楼于一九七五年重建，采用古典式建筑风格，造型风格颇具特色，门额“丈八烈士陵园”六个大字苍劲有力（见图）。园中矗立着一座高十六米的四层八角革命烈士纪念塔，建于一九四五年，为楼阁式古建筑，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整个建筑系砖木结构，雕梁画栋，飞檐走兽，经六八年与八二年两次整修，现在更显得古朴典雅，气势壮观（见图）。二层塔壁分别镶嵌着八面石碑，前方

（正南）镶着刻有鲁西北全体党政军民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清明节日敬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的石碑。有四面碑分别是冀南第一军区司令员白云谨述、冀南第一军区政治部主任于笑虹书丹“萧、张、史三烈士传略”的碑文，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 貝仲选敬撰、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兼冀南第一专署主任参议崔竹宜书丹的“鲁西北之士陵园纪念塔”的碑文，冀南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许萝侠敬撰、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丹彤敬书的“鲁西北军民抗战八年简志”的碑文，鲁西北日报社记者王鸣时敬撰、冀南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武委会主任杨新一书丹的“克履莘县城记”的碑文。还有三面碑上分别撰刻着元朝县、莘县、冠县、临清县、武训县、馆陶县、永知县和外籍为革命牺牲的（包括三名师级干部、十名团级干部、六名营级干部、九名连级干部、一



百零二名排级干部、一百零七名班长与五百四十一名战士，)共九百二十五位烈士的英名录。塔北三十米处是烈士展览室，三间展室内北墙上空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挽联，东西北三面挂着部分烈士的遗像及事迹，室内摆满了地、县党政机关部门及其他组织、团体敬献的花圈。园中北首是由鲁西北全体党政军民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敬修的“萧永智政委、张炳元同志、史钦琛主任等大小烈士墓二十三座。园内苍松翠柏，冬夏长青，绿草如茵，白杨参天，果树成方，鲜花盛开。整个园中显的庄严肃穆，生机勃勃。是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杨新民)

## 马本斋烈士陵园

抗日民族英雄，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马本斋烈士，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逝世之后，根据他生前愿望，葬埋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鲁西边陲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张鲁镇。张鲁镇的回族群众曾以最沉痛的心情，最隆重的民族葬礼“高抬”安葬了烈士，并献出清真寺地产十亩僻为墓地。在墓地植上了苍松翠柏。

一九五四年冬，在烈士逝世十周年之际，烈士遗骨迁往石家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为表达鲁西老区回汉族群众对马本斋烈士缅怀之情，政府曾拨款在原墓地修筑马本斋烈士陵园，也是全国较早的以烈士个人命名的陵园，当时陵园内筑有烈士纪念亭，亭内树烈士纪念碑，在原坟穴建造水泥坚固坟丘及在张鲁镇中心建造

马本斋烈士祠堂，以上建筑均在一九五五年竣工。

一九五九年夏，因一场风灾、将纪念亭刮倒，随在原址又建起砖木结构四门塔型碑亭。

一九八五年，为表达老区人民对马本斋烈士缅怀之情，由省县两级政府拨款九万元，重修了马本斋烈士陵园，新落成的马本斋烈士陵园的筹建工作自八五年元月份开始，十月份全面竣工、十一月一日举行了落成典礼。

修复后的陵园坐北朝南，由围墙闭合，包括由阿拉伯式穹型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型纪念亭、回族葬埋习惯沿用的坟丘及烈士纪念祠堂。整个陵园建筑物在南北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前后相辉，进得大门顿觉开阔敞亮，耳目一新之感。

陵园建筑是由原籍张鲁北安头村的解放军八七四九部队建筑工程师张春荣同志设计，张

鲁回族镇建筑队承建。门额“马本斋烈士陵园”的题字是由烈士之子马国超所书，阿拉伯文的配写是由原回民支队教长蔡永清阿訇书成。（附马本斋烈士陵园照片）（杨忠平供稿）

# 莘野古迹 千古光华

王合祥

## 一、莘地广袤 伊尹邈远

莘县的“莘”字在早期的汉字——甲骨文和金文（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不得而见。最早见于文献大概是《诗经·大雅》中的“缁女维莘，长子维行”和《诗经·小雅》中的“鱼在在藻，有莘其维”以及《国语·晋语》中的“莘莘耕夫，每怀靡及”了。上述两部典籍是我国先秦时代的著作。而汉代的许慎在编著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时未将“莘”字收录，显然是疏漏。

但是远在《诗经》和《国语》成书之前的商代初年，一位叫作伊尹的人便和“莘”字结下不解之缘。被称作中国封建社会二圣人的孟子说伊尹在出仕之前曾经“耕于有莘之野”。

（即在莘地的田野里耕种——合祥），而乐尧舜之道焉”。①后来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臣得以到商汤身边为“小臣”（“小臣”在商初地位甚高，管理王室的田庄、车马和随王远征）。辅佐商汤灭桀而建立商王朝。

伊尹这位历史人物离我们太邈远了，以至他的生平事迹在史籍中寥寥片言，语焉不详。《史记·殷本记》说他帮助汤灭桀，汤死后又佐外丙为王，后又佐中壬为王，继而辅太甲（亦称大甲）为王，太甲放伊尹于桐宫，三年后伊尹“摄行政当国”。太甲死后沃丁为王，沃丁时伊尹死，葬于商初的国都西亳。《古本作书纪年》则说他“放大甲于桐宫乃自立……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今本作书纪年》还有些记载与上说不同，但《今本作书纪年》王国维先生已考订其为伪书，故不足信。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伊尹是世俗贵

族的成员，由于国王对僧侣让步而使伊尹遭到杀身之祸②。大文豪苏轼称赞他是“行之天下不以为惊”和“临大事而不乱”的“古之君子”③。

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是值得纪念的。

于是，从明代正德（1506年—1566年）到民国年间十几个版本的《莘县县志》都无一例外的在莘县城北大里王村西建伊尹亭的记载。这些，当然不尽是旧时文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把伊尹看作是莘县最早的开发者，积淀着人民对祖先怀念的感性。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东昌知府程光珠周游府属诸县访古访得此迹，题写了

“莘亭伊尹耕处”并题“尧舜之道，畎（音狷④）（音晦）之中。圣作睹物，龙云虎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旨在传之千古而不朽。碑文系楷书，运笔结字软弱无力，为清代“馆阁体”一路的字，格调较低，不足称道。

此碑位于单庙乡大理王村西100米处，北边是通往大理王村的生产路。碑四周皆耕地，土地平展肥沃，依稀可以想见伊尹开发此地时的辛劳情景，只是未发现其他历史文化遗物。碑面西，高1·83米，宽0·74米，厚0·23米。石质甚粗，风化剥蚀较重，字口和四周的阴线缠枝藤花纹漫患而不清晰。尽管如此，莘县人民对此碑仍怀有深厚的感情，把此碑看成是莘县的象征。伊尹——这位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广邈的有幸之野受到人们的景仰。

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款，1984年7月下文公布，此碑为第二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文化部门也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为此碑修建亭阁，以利保护和观览。

①《孟子：万章上》



②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③苏轼：《伊尹论》

④“畎”字民国二十六年版《莘县县志》作“亩”当属舛误，予应纠正。

## 二 沙场烽烟浓 将军征战急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战事亦多。战争能给一个民族、一方黎民留下深刻创伤，也能留下传诵千古的佳话。发生在战国前期的马陵之战便是许多著名战役中的一个。

公元前341年（周显王28年，魏惠王30年），魏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在争夺天下的七雄中，韩国国势较弱，不足以抵挡魏军的锋锐。于是韩国便派人到齐国求援。齐威王经过再三考虑，采用了孙臧适时出兵的建议，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孙臧为军师。挥兵直指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

战斗在韩国前线的魏国大将庞涓闻讯后急忙撤军回国。魏惠王知庞涓人困马倦，难以制胜齐军，又派留守在国内的太子申协助庞涓夹击齐军。孙臆深知庞涓的骁勇和轻兵冒进、妄自尊大的性格，以增兵减灶之计诱魏军冒险深入。选择了马陵道口一带的有利地形打伏击战。庞涓率领魏军来到马陵道口一带的深谷时，正值深夜。齐军以火把为号，万弩齐发。魏军只顾前进，未防伏兵，顿时乱作一团。庞涓情知中计，无法突围，拔佩剑自刎。太子申被俘后也遭诛颈之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认为，孙臆在桂陵之战“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中诱敌深入的打法可以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有益借鉴①。

对于这场战争的始末，那个“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②的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和绘声绘色的描写③。孙臆的军事才能和成功的作战经验被历代军事家热烈赞赏和奉为圭臬。成书于清代的《东周列国志》，虽然算不上文学史上的堂堂大作，但关于马陵之战的情节，写来也引人入胜，甚为动人。戏曲、曲艺等讲唱文学作品不少也取材于孙庞斗智的故事。说明了马陵之战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文化人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关于马陵之战的地点，是史学界多年聚讼的问题。郭沫若同志，谭其骧先生和杨宽教授认为在山东鄆城西。王伯祥先生认为在河北大名。雪华同志认为在范县西。《辞海》（历史分册）1976、1980两个版本一说在河北大名，一说在范县西南。笔者曾于1982年9月10日函询上海辞书出版社。该社总编办公室于同年10月6日以〔沪辞史字82、163

号)文复函笔者云：“古战场遗址可能在今范县西十里马陵——道口之间”。

马陵位于大张乡东南4公里处，道口位于樱桃园乡(亦今范县所在地)西南2·5公里处，两个村庄相距6公里皆座落在金堤河北岸，因顺河流向建屋，村中房屋、胡同、道路无一不斜，且拐弯甚多，极为曲致。进村后极易使人迷失方向。据说孙宾当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马陵村东有一路沟，传说齐军当时即置伏兵于沟两旁。庞涓自杀后，和魏太子申皆葬于马陵村中十字路口。

笔者因工作需要，对于有关马陵之战的历史文献如《战国策》、《史记》等做了较多的翻阅，多次到实地进行考古调查，考虑河流改道、泥沙冲积等因素对地形地貌的影响，进而推断齐魏之战的地点，应该说是在马陵——道口之间，较之鄄城说和大名说可信度要高得

多。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20页。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史记》中的《孙子吴起列传》和《魏世家》均有记载。

④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杨宽：《战国史》，雪华：《古代著名战役》。王伯祥：《史记选》注。

### 三 内涵丰富 源远流长

在朝城一带，一提起孟洼、孟坡、大洼来，可说是老幼皆知。你如有机会和他们交谈，他们便会以极高的兴致，天方夜谭般的向你讲述有关孟洼的故事。

孟洼位于朝城西南2公里处。遗址南面是东西两个孟庄，北边是一条东西流向和走向的

水渠、生产路，西边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生产路。路旁有一砖窑，东边为一道迤邐不平的曲屈土崖。遗址比四周耕地低0·5——0·7米，为一盆地，孟洼者，东西孟庄村后一大洼地。

1978年，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下文公布孟洼为聊城地区第一批地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表面，陶片、瓷片比比皆是，灰坑也时隐时现。有文物考古常识的人，一看即知为一古文化遗址。陶片以灰色者居多，红色较少，器物多为罐和盆、从陶质、器形上看，多为汉代遗物，距今已有20个世纪了。瓷片为粗白瓷，器物为盘和碗，为宋元时期的东西。在遗址中曾发现和征集到一件唐三彩道士。质地细腻，釉彩光华艳丽，做工精良。1974年在遗址中挖台田沟时曾出土数件陶罐、发现房屋和灶坑、街道遗迹。遗址东北部是臧洪

墓。臧氏生前曾出任东郡太守，故当地呼其墓为太守坟。臧洪（160年——195年），东汉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东）人，字子源，任即丘长。董卓专权时为广陵太守张超功曹，说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佃联合讨卓。继归袁绍，任青州、东郡太守。后因故和袁绍反目，绍发兵困洪于东郡，破城杀洪。臧洪事迹，见于正史。《后汉书·列传四十八》即为其本传。《中国名人大辞典》，《辞海》，《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均有著录。遗址的西南部是会盟台，也称会朝台或桓公台。当地人管其叫孟家骨堆或大骨堆。制高点为9·5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未见夯土痕迹，但层次甚清。《朝城县志》说此台为乃春秋齐桓公会诸侯于此。1977年此台东露出砖门，显系一墓门，此台为大型古墓无疑，会诸侯于此因之建台和其他传说当不攻自破。实物作证，比任

何文献和传说更有说服力。

遗址中的陶片为汉代遗物、瓷片为宋元遗物，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元，表明先民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文化序列，可谓源远流长。地上地下蕴藏器物之多，可谓内涵丰富。象这样大面积的古文化遗址在莘县是绝无仅有的。在考古学的价值当然会受应有的重视。

#### 四 巍巍丰碑 恢宏气象

碑在我国出现，始于东周。当时的碑主要用作宫庙门前测日影记时或门内栓牲口或墓葬下棺时置辘轳。在经过加工的石头上刻字纪事、颂功的碑则是汉代兴起的。齐梁时期的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所说的“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的话，证之以北宋以来的金石著录和大量的实物是可信的。



我国的碑刻发展到唐代，从内容到形制形成独具的风貌。“欲访唐碑当入秦”，①就是说唐代碑刻大都屹立在广袤的秦川（即陕西）。座落在我县董杜庄乡梁丕营村200米处的韩国昌、韩允中父的墓碑是目前聊城地区仅存的两通唐代碑刻。

由于屡遭破坏，韩氏父子的墓已荡然无存。只有墓碑巍然屹立在辽阔的原野上（国昌墓碑于1966年“破四旧”时用拖拉机拉倒，上部砸坏）。允中的墓由于自然下沉和泥土淤积，龟趺（俗称碑坐）和碑体下部近一米埋在地下。地上部分高5·2米，宽2·10米，厚0·74米。下部两侧残损较重，字口破坏也甚重，上部字口未遭人为破坏，剥蚀亦轻，故锋棱宛然、清晰可观。碑冠为高浮雕蟠龙吸火距，而非通常的龙吸蛛图案，构图受佛教影响是显尔易见的。构图雄浑壮阔，章法匀

称合理，线条遒劲有力，刀法娴熟而又沉着肯定，气格恢宏瑰伟。碑额为小篆“唐故魏博节度使韩公神道碑”十二字玉筋金钱，为李阳冰（唐代以篆知名的书家，诗人李白的族叔）一派书风所笼罩。碑文为欧体楷书、工整秀俊，挺拔险劲，因下部碑文剥蚀，故书丹者姓名不详。碑体下一昂首负重的龟趺。碑石选用上等水成岩，石质细硬，碑面平华。碑东北50米处有一武士牵引石马，马身长2·45米，全宽1·30米，腹宽1·00米，腹部至背部0·85米，鞍长0·74米，鞍跨度1·34米，高约1·70米，武士头已砸坏、立于马左。造型浑穆雍容，丰伟蕴籍、线条生动流畅、洗练简洁而又逼真传神，典型的唐代石刻风貌，显示出上升时期中国中世纪石刻艺术的雄强和典雅之美，其气度和格调远非宋元以后那些以小巧取胜的石刻品所能同日而语。

早期的《莘县县志》，曾据较完整的拓片将碑文抄录于志。据碑文听载，韩国昌祖系汝南郡人，曾祖、祖父母、父亲均为魏博节度押衙一类的小官。国昌死于唐大中六年（852年），停尸于魏州元城县（今河北大名附近），享年六十六岁，以此上推65年当生于唐适宗贞元元年（787年）。碑立于唐咸通十三年（870年），吴哇撰文。官累左散骑常侍。常待原为皇帝的近臣或由宦官（太监）兼任，北魏以后改为正规官员担任，不再由阉人兼职。在唐代散骑常侍分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虽无实权、但社会地位不低，不失为显贵。允中为国昌长子，官累魏、博二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节度使在唐代是炙手可热、实权在握的军政显官。“安史之乱”以后，许多节度使名为人臣，但常不受君命，自居一方，好似土皇帝。允中死于乾符元年（874年）

终年61岁，以此上推六十年当生于814年。碑文为讷于浚撰。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为灿烂的一页。国力之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步的。唐碑高大雄伟的体魄表现了唐文化的宏伟气概。象韩氏父子那样的墓碑只能出现在封建盛世的唐代。

山东汉碑之多，雄居全国首位。但唐碑却寥寥无几，象二韩这样高大的唐碑更是绝无仅有，因之也益见其珍贵。

①叶昌炽：《语石》

## 五 区区墓志一盒 郁郁泥土芳香

1977年冬，妹冢村农民在村中境内挖土积肥时发现一座唐墓。据目击者说，墓内出土的尚有铜币，铜盆、陶罐等器物。现在这些器物丢损殆尽，只剩下墓主人王宪夫妇合葬墓

志。笔者1982年10月曾经前往姝冢对墓志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拓制。拓片除去上报省、地文博部门外，现有精拓一纸藏县馆文物库房。

墓志是放在墓中的方形刻石，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平等，内容近乎现在的悼词。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盛于隋唐。风靡所及，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

从志铭看王宪原为太原人，高祖王岩，曾祖王蹈，父王甫。自称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宪时迁到魏州朝城武阳乡已五世。歿于唐乾宁元年（894年）。以享年七十四岁上推当生于唐宪宗16年（821年）。

王宪夫妇墓志为正方形盩顶式，边长0.37米，底厚0.10米，铭文15行，行7——24字，凡227字。字写得草率粗疏，有蓬头乱服的样子，但线条不乏骨力，结体天趣馨露，

不失生动。志盖篆书“唐王公杜口寿口墓志铭记”，工谨不足，萧散有余，信手写来，漫不经意。志盖的坡面上，以阴线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和志文一样信手为之，出自民间匠人之手，一派犷悍朴放色彩，无文人清新淡雅之气，却散发出泥土的芳香。

## 六 摩天古塔 巍峨壮观

在辽阔的中华国土上，很多地方都有令人崇敬的古迹，耸立在莘县城内的古塔正如它自身的面目一样，在世世代代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崇高峻伟，巍峨壮观的伟大形象。

我国古代的塔是随着佛教从天竺（即古印度）传入的。传入中国后便逐渐汉化了，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塔本佛塔，俗称宝塔，或以地名呼之，如景州塔、临清塔、莘县塔等。也有将塔称作浮屠的，《说文解字》释塔为“西域

浮屠”，用以藏经卷，因而塔下多是寺院，如西安大雁塔下便是著名的慈恩寺。有关莘县塔下佛寺的情况，没有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留传至今，思之憾甚！塔的形制甚多，但多为平面八角形。以砖、木、石等材料筑成。莘县塔为楼阁式十三级平面八角形砖塔。据县志记载，塔“东西阔十四步，南北阔十三步（换算成公制东西长约23.20米，南北长约21.60米），高十三跏（按：此“跏”字和“级”字同音但义不相通，县志作“跏”，当属别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南宋绍兴9年）建”。

塔有四门，入北门可攀登到顶部，南门内有一石雕女神象，1928年破除迷信时被拉掉。因塔形体高大、历史上曾被用作军事瞭望台。

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地震波及莘县，塔顶部有砖落地，1968年春天，在党政领导机关都陷于瘫痪状态的情况下，由所谓革命造反

派主持，将莘县人民崇敬的这一高大雄伟的古建筑拆掉了。拆掉古塔的“革命行动”令人痛心不已，这种愚蠢的行为，给莘县人民留下了极深重的精神创伤。

塔内出土的有五部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一部写本《陀罗尼经》、一个精制的小银塔和一具石函（棺），函内有水，水上漂浮着银质薄片船、水内有舍利子。

“妙法莲花经”又名“法华经”，系佛教中天名一宗奉诵的经典，因用莲花喻佛所说教法的清静微妙而得名。塔内出土的两部《妙法莲花经》最早刻印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最晚刻印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皆以罗纹麻纸印行。纸厚而质韧，因年代久远，已呈微黄色。从雕版艺术看，每卷佛象构图各异，线条细而圆融，法象庄严圣穆，字体方正遒丽，刀法娴熟富于变化，洵为宋版书之上品。



“陀罗尼经”又名“陀罗尼经”，表示对所闻法义能总摄忆持，不会忘失。佛教密宗认为其咒语能包容多种含义，似与儒家的微言大义相通之处。塔内出土的《陀罗尼经》装在木匣内，出土时纸墨如新，书写不甚熟练、可能出自年青的经生（古时以抄写经卷为职业的人）之手。

小银塔用银质薄片碾合而成而非铸件，约略相当现在的钣金工艺，因而更见其为之不易。塔身造型优美，玲珑剔透，工艺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上述经书、银塔现均藏山东省博物馆，石函现藏莘县图书馆文物室。

1981年5期和1982年12期《文物》杂志提及并专门介绍了上述经书，高度评价了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石函上刻有“治平元年”（1064年）的字

样，据此可知塔于始建1064年而非金天眷二年。出土文物可证史籍之舛误，此又一例。

## 七 庞然大物 精美绝伦

现今莘县版图上的古城镇，原为范县县城，颇多名胜古迹，而现在仍然屹立在古城中学院内的金代大铁钟，便一向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钟在我国出现甚早。西周中期就有十几个大小相递成组的编钟和大而单一的特钟。是一种音色极美和表现力很强的乐器，她是灿烂的青铜文化的崇儿。秦汉以后，钟的用途发生了变化，有的用作盛粮盛酒，有的用作乐器，也有的用作礼器或观赏品。花样百出，名目繁多。《说文》释钟为“酒器也”，显然是以偏概全。晋唐以降，随着佛教、道教的盛兴，钟经长期衍变，形体较前硕大。大都停放或悬挂在

郑重的场合以增强其神圣气氛。佛门释家为了显示其神秘和无上，更是在寺院内大放其钟。解放前我国一些较大的寺院往往停放着形体宏大的钟，其源头可溯至晋唐。不过随着取矿和冶金技术的进步和青铜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后来的钟多非铜质而系铁铸。古城中学院内的大钟就是铁铸的。

《续修范县县志》（1935年版）记载“大钟在来钟寺，今移中山公园。高9尺6寸，围径19尺5寸，上部厚8寸，下部厚2寸4分。承安四年六月初六日铸造”。

笔者自1980年以来，曾七度到铁钟停放现场进行了较为精细测量和初步的研究。钟体高2·41米，钮高0·49米，通高2·90米，下部厚0·07米，上部厚0·09米，唇部直径1·77米，围径5·5578米。顶部钟钮由两条气度凶悍的蟠龙高织而成。钟

体上除少数较小的文字和较细的花纹泐蚀外，大都清晰可见。钟体下部为一周阳线植物形花纹，上面是较小的方格，其中的一格内有“承安四年（按即1199年，金章宗11年，宋宁宗庆元5年）六月初六日铸造”的字样，以上是较大的方格，以八卦纹作界格，格内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法轮常转”，“国泰民安”的铸字。自此至顶部皆为气象雄浑的云雷纹。

据古城东街的农民反映，1975年平整土地时，在中学周围发现一些坩锅和泥范。范上的花纹和字样与钟上完全相同。无疑为铸钟时所用，说明此钟从铸至今原本未大作移动，县志记载甚不可靠。古城一带关于此钟系闹大水时冲来的传说，固然不失为民间文学创作的素材，但无法信为史实。

此钟形体硕大，气势磅礴，丰伟刚厚，花

纹布局匀称合理，具有东方古典的凝重之美。工艺水平之高，铸造之早，保留之完整，为目前聊城地区所仅见，庞然大物，弥足珍贵。

## 八 怪中俊杰 艺林高手

### ——郑板桥及其遗物

范县设置很早，知县者也众。但大都为人民群众忘却，那个一向不肯自我吹嘘时而自暴自弃、自哀自怨的郑板桥，却在范县一带人民群众的街谈巷语中，在文人墨客的雅叙阔论中一直乐道不休。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板桥居士，江苏兴化（今扬州）人。清代优秀的书画家、诗人。

乾隆元年（1736年）四十四岁的郑板桥赴京试礼部中进士。六年后怀着“匡世济时”的抱负和不凡的才情出任范县县令，四年后又调

潍县（今潍坊）。乾隆18年（1753年）因为请求赈济而得罪上司被罢官回到家乡扬州。重新开始了卖字鬻画、饮酒赋诗的文人生活。穷愁潦倒、愤世嫉俗，乾隆30年（1765年）病死在家乡，享年七十三岁，葬于兴化城东管院阮庄。

郑氏在范县任职仅四年，但为人民留下了永久的怀念。

郑氏为官清正，对人民实行轻税薄赋。他办事认真，从政清廉，为官期间“无留牍，无冤民”，当罢官返乡时。“囊橐萧然，图书数包而已”。每当河水暴涨之季，他亲率民工日夜守护堤岸，培堤浚水，减轻了洪水造成的灾难。

作为文化人的郑板桥，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经常到乡间私学走访，指导学童读书习字，有时甚至接济贫家子弟就读。所有这些至今在古城一带广为流传，每每谈及，人们对这

位饱学清廉的县令盈然而生景仰之情。

作为诗人、书画家的郑板桥，在范县任职期间，政务之余，笔耕不辍，勤奋创作。这期间创作的诗歌，现在能确考的有近六十首。著名的《道情十首》便是知范县期间增删、润饰、定稿的。《登范县城东楼》讴歌了范县人民在僻地薄田上经过辛勤劳动获得丰收的情景。《范县诗》不仅写出了范县一带“春花淡寂，秋实离离”（“离离”乃农作物繁茂之状。见《诗经·玉风》“彼黍离离”——合祥）和“枣花侵县，麦浪平城”的富庶秀丽景色，给人以恬静而富有的美感；而且将范县、莘县一带呼大麻雀为“老赵”的方言写入诗中。不辟俚俗、大胆将方言化入诗中，产生了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亲切感人，饶有兴味。在范县期间的书画作品也不少，可惜现在大都无从查找了。只有他为仲子庙题写的匾额，虽

然残损却有幸保留到今天。此匾原悬挂在古城城郊仲子庙的正门上。一九六六年“文革”兴起，仲子庙被拆掉，幸亏北寨一农民将此匾拿回家中。1982年3月在古城公社党委和文化站的积极配合下，将此匾征集到县图书馆入藏。

《仲子庙》匾额，长1.19米，宽0.40米，横书“仲子庙”三字，字径约0.31米，左端直书“郑燮书”三字，皆为阴刻。从现在的情况观察是以硃丹将字写在木板上，着刀镌刻，然后涂之以黑漆。现木板局部朽烂，字也有损蚀，但轮廓可辨。“仲子庙”三个大字基本上是藏锋落笔，迴锋收笔，此即历来书法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无往不收，无垂不缩”的书法。线条饱满挺实，厚重有力。“郑燮书”三字方圆皆备，相间有致，飞动灵秀而又不失雍容蕴藉，且和三个大字在韵调上和谐一致，构成了作品的整体美。从楷隶相间、行融



其中的作品中，显现了郑氏“六分半书”的艺术特色。

从用笔、结体、章法等特点和流传有序的情况看，此匾可以肯定出自郑氏手笔。

①《重修扬州府志》卷四十八。